

新 認 識

第一卷 第三期 目錄

新認識論壇	論我國社會之構造	論澈底的政治路線	力行的理論與方法	知難行易學說之研究	現代經濟組織的新動向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民生主義的社會基礎	經濟史觀的批判	黑格爾精神的認識	論人生真諦	對於世界和平之認識	敵國戰時金融之危機	進寇維谷的日經濟政策	倭寇侵奪下的美國對華貿易	憲政與自治	考試訓練與任用	憲政實施後之黨治問題	讀者信箱
修業等	陳石學	耿修業	張維漢	項維漢	楊覺農	郭博宜	胡鴻烈	沈宗烈	李宗烈	段宗烈	張道行	羅遠行	王森才	汪先興	劉漢興	楊允元	薩孟武等	

新 認 識 月 刊 社 出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新認識論壇

歐戰擴大與東亞和平

歐洲戰爭最近已轉入一新的階段，德國既於上月用迅雷不及的掩耳手段，完成它在北歐所預期的戰果，今又以閃擊戰與降陸戰的超然最新戰術，進犯荷比盧三國，短短的數日之間，竟又使荷蘭全軍潰退，慘向德國投降；而比京布魯塞爾行將受英臨城下的嚴重威脅，英法聯軍雖正竭力增援，以期堵擊德軍，俾可從容布置，但就最近幾天的戰局觀察，聯軍雖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因此頗引起關心時局人士的憂慮，正在從事抗戰工作的我們，格外不好忽視。

其實，我們對於國際情勢演變的看法，若憑爲運用外交政策的參考則可，若隨其一張一弛改變悲喜的情緒則未免不妥，我們有時誠然要從國際的觀點來理解我國抗戰的意義，我們也誠然應該運用種種外交上的策略，又取得國際友邦的同情和援助，但我們萬不能陷於膚淺歪曲的國際主義，盡做外國人的尾巴，我們要堅守「以不變應萬變」的基本原則。王外長最近對美廣播，重申我國立場，略謂「無論國際情勢最近之發展如何，中國外交政策，並無變更，……吾人抵抗日本侵略之堅強決心，始終不渝，非至日本軍閥償贖其破壞東亞和平與秩序之罪惡，吾人決不停止抗戰，戰爭時期如何延長，非所計也，」這是如何明瞭堅決的說明！

我們不否認：在三年抗戰的過程中，我們確實獲得許多友邦的物質幫助，但這與其說是他人予我的恩惠，毋甯說是我們應得的報償，我們是爲國際正義而戰，我們爲東亞和平而戰，我們曾不揣本身力薄的單薄，毅然擔起世界膺懲強盜的重任，難道這無英勇行爲不值得表示同情和給予援助嗎？即以最近情形而論，由於歐戰的突然擴大，太平洋上的風雲也驟然動盪起來，尤其荷蘭既已捲入戰爭的漩渦，荷屬東印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日本對南洋羣島早就躍躍欲試，但因他被他深深的拖陷在泥淖裏，本無力去實現他南進的野心，所以這一切義舉，我國抗戰實際上業已保證了英國的香港新加坡，緬甸印度的拖障，如果真沒有完全喪失的話，我們是應該得到別人的援助，我們是應該把我們是東亞唯一的和平力量，對於戰途的，我們兩個比較可靠的預測，不過就目前的趨勢而論，而日本必俟英法蘇美法蘇皆無力東顧時，才敢獨自，率領英法美蘇四國之力，我們兩個比較可靠的預測，不過就目前的趨勢而論，而日本必俟英法蘇美法蘇皆無力東顧時，才敢獨將他東亞方面仍記着！我們有獨立自主始終不變的外交，我們咬緊牙關始終不懈的打下去！（漢才）

惟有團結方能勝利

記得神聖的抗戰一發動，中國共產黨就坦白的宣言信仰三民主義，擁護抗戰國策，澈底精誠團結，全國朝野沒有一個人不興奮，不欣喜，即便從前與共產黨站在對敵立場的人士，或者曾經遭受過共產黨蹂躪虐待的同胞，也都刮目相看，表示十分的欽佩，寄與無限的同情，從新認識共產黨人還沒有拋棄這擁有光榮的歷史，而現在在風雨飄搖中的可愛的祖國。

可是口號與事實畢竟是兩回事。口號儘管可以高唱入雲，堂皇動聽，而事實却可以南轅北轍，大謬不然。這對於一向相信「口號就是事實」的全國忠信的同胞，該是如何的失望。

最近有幾個朋友新從冀察前線歸來，我們很關心的問到前線的戰事，希望從他們的報告裏，找出一點精誠團結的證據出來，一方面認識真相，同時也可加強信心，然而在這方面，却使我們感到失望的！

他們很感慨地說着，共產黨人如何從事反三民主義的宣傳，如何培植自己的勢力，侵擾這已經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冀省的同胞，很痛心的，是不但××集團軍與國軍不肯密切的合作，並且往往趁國軍勢力孤單的時候，乘一個突如其來的殲滅，軍隊是如此，至於其他黨政人員的無辜被害，更是屈指難數，結果弄得河北省內的抗戰實力一天天的削弱，坐使敵人休養生息，日益強大。他們時常聽見××集團軍裏流行着兩句口號，一句是「提高我們的警覺性」，一句是「準備突然事變」，這兩句口號勿聽起來是很好的，實際上却是最值得痛心的，原來所謂「提高我們的警覺性」，這警覺性不是對付敵人的，而是對付自己的國軍。所謂「準備突然事變」，是指等候適宜的時機，對國軍來一個突如其來的殲滅。

更痛心的，是近幾月以來，因為河北水災為患，所以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數十百萬的同胞背井離鄉，骨肉離散，無衣無食，在塵埃滾滾逃亡的生活，這一幕極人世間至慘的悲劇，却因為××集團軍的劫掠民食和阻礙放賑而更加深其悲慘的程度。他們更細細的訴說××集團軍如何以救國捐的名義將民衆們一點僅有的賑糧完全搜去，如何苛待一般社會上的中堅份子使他們逼上梁山，跑到偽組織去。這種使人悲痛的事情，我再不願意向讀者諸君轉述了。

雖然這幾位朋友是我們向來佩服的極忠信的朋友，我們應該可以相信，他們的話毫無偏私，完全是客觀事實的說明！完全是親身痛苦的经验，是虎口餘生中所取得來的結論！
然而為了國家，為了民族，我虔誠的盼望他們的話句句是響壁虛造的，即使是不可能的話，也但願他們所講是過去的事實，現在不是如此，將來更不致如此。
另一方面我們更希望共產黨諸君能够謹守信言。口號與事實絕對不能脫節，尤其是在這國難如危卵的今天，我們絕對不能拿民族國家的生命開玩笑。
最後我們要特別聲明的，我們絕對不願意把這種不好的消息帶給國人，但是為了抗戰，為了建國，我們又不得不把我自己的缺點先暴露出來，然後再設法去克服。今天我們本着春秋實錄賢者之意，一心盼諸共產黨諸君子對於抗戰建國的事業多貢獻一點力量，不要開口說來表示精誠團結，要用錢一般的事實來證明精誠團結，用具體的行動來掃蕩這日漸滋延的流言，共產黨諸君子勉乎哉。（覺農）

論我國社會之構造

陳石孚

舊日學者把我國社會分爲四個階段，例如穀梁傳說：「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這四種人民，更可分爲兩大類，即生產階級與不生產階級，農工商屬於前者，士屬於後者。這個意思孟子解釋得最清楚，他說：「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士人勞心，農工商勞力。我國社會素來重視文人，把士認爲四民之首，所以他們應當治人。反之，農工商乃體力勞動者，在古代傳統觀念裏，他們是一些被輕視的階級，所以應當受着士人的統治。古人把農工商視爲生產階級，據司馬遷引周書的話，即可充分表現：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史記貨殖列傳）

把我國整個社會，分爲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大體上是可行的。不過這種分類方法，比較適宜於古代社會，自秦漢而後，社會裏有幾個新的階級出現，因此這種分類法，須加以相當修正，方可適合於後世社會的實情。這些新的階級是官吏、兵士，和游民。官吏階級的構成，遠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列國紛爭，政出多門，士大夫小小的諸侯，卻想稱霸

天下。因爲他們懷着這種野心，所以就盡力招致一些聰明才智之士，作爲他們的輔弼，而那些聰明才智之士，也樂於接受人主的知遇，出來做一番拯救蒼生的事業。這樣，就產生了一個以做官爲職業的社會階級。孟子終身栖栖遑遑，其目的在想做官，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也是因爲同樣原因。先秦時代的官吏階級，可以張儀蘇秦兩人爲典型的代表。據蘇東坡的估計，這個時候官吏的人數很多，約當於農夫的四分之一。蘇東坡說：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白河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鳴狗盜之徒，莫不資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魏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職國任俠論）

這段文章本是討論養士問題，最後一句指出養士的數目，約有官吏的一倍，農夫的一半。換言之，社會上有兩個養着的士人，便有一個官吏和四個農夫。因此，我們說官吏的人數，約當於農夫的四分之一。這個數目，雖然只是蘇東坡的推測，沒有精確統計作爲根據，不過在春秋戰國時代，

我國已有階級的存在，從這一段議論看來，却是可以斷定的。

我國古代人皆有當兵的義務，人民就是兵士。兵士就是人民，所以沒有一個特殊的兵士階級。馬端臨說：「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皆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就是指這種情形而言。但到了後來，人民自是人民，兵士自是兵士，於是乃有一個特殊的兵士階級出現。馬端臨繼續說道：

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作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保國祚矣。（文獻通考序）

顧炎武有一段議論，說得更加詳盡：
嘗考古春秋周禮寓兵於農之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制兵與農而二之者，三代以下之通弊，制軍與兵而又二者，則自國朝始。（按國朝二字乃指明朝而言）夫一民也，而分之以為農，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一兵也，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軍，又分之以為兵，是一農而二兵也，愈弗堪。一兵也，而分之以為衛兵，又分之以為民，又分之以為募兵，是一農而三兵也，又益弗堪。（亭林詩文集軍制論）

除官吏與兵士而外，在秦漢交替時期，社會上還出現了一個游民階級。一切沒有正當職業的人，叫做游民。游民的出現，大抵由於兩種原因：第一，社會秩序的紊亂；第二，經濟組織的崩潰。當戰國時代，各國連年戰爭，殺人盈野，社會秩序為之大亂，這正是造成多數游民的一個大好機會。其次，當時經濟發達，人口增多，然而土地生產力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沒有繼續增高的可能。在這種情形之下，土地受着報酬遞減律的支配，而人口却有增無已，因此，一部分人便感覺生活困難，勢必鋌而走險，流為盜賊。這樣講來，可知當時經濟組織的崩潰，也是產生游民的一種重要因素。楚漢之際，最初發難的陳涉，是一個「望廬編織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引賈誼過秦論語），他統率着一些「適戍之衆」，揭竿而起，於是「山東豪傑」都起來響應他，終於把秦朝滅亡了，可見游民勢力的偉大。後來兩漢創業垂統的君主劉邦，也是以游民起家，史記高祖本紀，載着一般大臣的話，說「天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正是指此事而解。劉邦手下的輔弼，例如韓信，黥布，彭越等，是一羣乞丐，囚徒，和強盜，張良把這些人叫做「游士」（見史記留侯世家），游士也就是游民的意思。我們可以說，漢朝天下，是一個游民天下。同樣，明朝也是一個游民建立起來的朝代，明史太祖本紀說：「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逾月，遊食合肥」，孤無所依和遊食合肥兩句話，是一幅朱元璋早年的寫照。劉邦和朱元璋，以游民出身，奠定了漢明兩朝七百年統治權，這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大奇蹟。以上乃就游民在政治方面的活動而論，此外，他們在社會方面的潛

勢力，那更是一件有目共視的事實，沒有詳細討論的必要。

士，農，工，商，官吏，兵士，和游民，是我國歷史的七大階級。這些階級的區分，乃以美國學者麥凱佛（McKee）所謂之社會距離為標準。（見麥氏所著『社會之組織及其變遷』）。我國古代雖然未曾發生階級鬥爭，但是這七個階級之間，却相互的保持着「一種社會距離，彼此不相接近，士人以世代書香為榮，他們不屑與那些體力勞動者為伍，換言之，他們和其他階級之間，有一條顯然的鴻溝存在着。古語說，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班孟堅在兩都賦裏，歌詠着士農工商各安舊業的盛況，他說：『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畝，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會之規矩，案乎隱隱，各得其所』。這些話都可以表現，我國古代社會階級，有很大的固定性，而且每個階級都嚴格保持其固有地位，不敢侵入其他階級，同時也不容許其他階級的侵犯。這種情形，在官吏階級，尤其顯著。他們自矜門閥，平日交往必係官場人中，男婚女嫁必須門當戶對。凡此種種，都是社會距離的表現。古代士大夫鄙視兵士的地位，說甚麼『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兩句俗話正可反映舊日社會對於兵士的估價。至於那些無業游民，更是不足掛齒。士大夫這種態度，當然不免失之過偏，然而古代社會裏確有這種心理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認的。

在這七大階級之中，農工商從事於生產工作，士人，官吏，兵士，和游民不從事於生產工作。農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工人有一技之長，商人經營有無，這些都是生產事業，已為舉世所公認。不過我國自古以農立國，所以在一般人的思想裏，農人的地位，似乎比較工商的地位為高。這種思想，可以班孟堅為代表，他說：

乃甲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織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澹瑣，穢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靡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兩都賦）

班氏視農桑為本真，斥工商為末偽，足以代表古代社會大部分人的觀念。不過少數開明的思想家，也有反對這種態度的，例如黃宗義便是其中之一。他說：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明夷待訪錄財計）

黃氏說『工固聖王之所欲來』，乃指中庸『來百工』，一語而言，他說『商又使其願出於途』，乃指孟子『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二語而言。可見黃氏的主張，就是孔子孟子也表贊同。

總之，無論班氏尊重農桑，鄙棄工業也好，或黃氏農工商並重也好，這三個階級從事於生產工作，却是班黃兩氏的共同意見，也是我們近代人的一致認識。

除農工商而外，其餘士人，官吏，兵士，和游民都是不生產階級，士人是一個不生產階級，袁枚說得最明白：

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

此二者皆養士也。所謂士者，不能養士民，養不能自養也。（小倉山房文集原士）

官吏是一個不生產階級，可從史可法和顧炎武兩人的議論看出。史可法說：『通者國家人才日耗，仕路日滑，皆因名心盛而實業不修，議論多而成功少』（論人才疏）。官吏更喜發空論，名利素心，這決不是從事生產工作者所應有的態度。顧炎武說：

除君曰，士不幸而際此，當長為農夫以沒世，一經之外，或習醫卜，慎無仕宦。嗚呼，可謂賢矣。余出游四方，嘗本其說以告今之人，謂生子不能讀書，實為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猶之生女不得嫁名門舊族，實為賣菜傭婦，而不可為目挑心招，不擇老少之倫。而滔滔者天下皆是，求一人焉如陳君，與之論心述古而不可得。（亭林詩文集常熟陳君墓誌銘）

顧氏認商賈百工技藝為食力之流，勸人實為商賈百工技藝，而不可求仕，可見仕宦必非自食其力之人。

兵士從事戰爭，其工作純係破壞性質，故古今中外一切窮兵黷武的國家，必然弄得民窮財盡，一蹶不振。史可法生當社會擾攘不安的時候，他太息着說道：『今天下之最厭苦者，惟賊與兵』（復徽州紳士書）。他把兵士和盜賊相提並論，認為當時一般人民厭苦兵士，好像厭苦盜賊一樣。這種情形，我們須歸咎於舊日社會的不良，而不能歸咎於兵士的本身。假使兵士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為國家作干城，那麼，史氏的批評當然是不通用的。不過兵士不是一個生產階級，却是歷史上的一件客觀事實。

游民不是士個生產階級，尤屬顯而易見，因為游民二字，本來即係指一切沒有正當職業之人而言。他們沒有正當職業，當然無生產可言。史記高祖本紀說劉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這句話可作游民二字的注脚。同書又說：「高祖起為太上皇，諱曰，始大人常以巨無賴」，無賴二字也正是說明同一意義。游民不惟不能生產，而且魚肉鄉民，為害甚大，所以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中說：「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又說：「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見明鄉官虐民之害條）。此處所謂縉紳，奸民，勢要，勢家，也就是游民的別稱，這是明朝的情形，其餘各朝也大體相同。總之，游民在我國歷史裏的勢力，乃非常之大。

以上我們把士人，官吏，兵士，和游民，分別說明其非生產階級的理由。現在我們還可以引蘇東坡的一段話，來把這個意思總結起來。蘇氏說：

夫智勇謀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悉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戰國任俠論）

智勇謀力四字作何解釋？智字指士人而言，那是我們應當承認的，因為士就是讀書人，而讀書人必有智識。勇字指兵士而言，那當然也沒有問題。辯字指官吏而言，因為官吏最重要的條件是口才。一個人有了口才，就可以做官，所謂「立談而封侯」（引揚雄解嘲語）者是也。司馬遷記載漢高祖踴劉敬的話，說：「齊虜以口舌得官」（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

傳)，正是這個意思。揚雄還有一段文章，把官吏那副口若懸河的神采，寫得生氣勃勃。他說：「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解嘲）。從司馬遷和揚雄這幾句話看來，可知蘇東坡所說辭字，是官吏階級的特徵，已經沒有懷疑的餘地。力字指游民而言，因為我們方才說過，游民在我國社會裏的勢力，是異常雄厚，上之，他們可以建立漢明兩大帝國，下之，他們可以武斷鄉曲，魚肉細民。沒有力量的人，決不能做出這些事業來。

士人有智，兵士有勇，官吏有辯，游民有力，故蘇氏所謂智勇辯力恰好相當於士人，兵士，官吏，和游民四個階級

論澈底的政治路線

一

信仰三民主義，擁護三民主義，在目前不是澈底與不澈底，真誠與不真誠的問題，而是今天與明天的問題。

的確有一些人在特別強調着「今天」這兩個字。三民主義是「今天」全民族的共同信仰，是「今天」全中國各黨派共同擁護的「抗日救國」綱領。所以在「今天」，大家的態度非常真誠，願為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

可是，「等到了明天，到了抗日勝利的明天，三民主義是否仍為全國所信仰，大家所擁護呢？問題便從此發生了。

。蘇氏說這四個階級，都不能惡衣食以養人，反之，他們皆役人以自養，換言之，他們自己沒有生產能力，必須依靠農人工人商人，方可維持生活。

總而言之，在過去兩千年內，我國社會一方面有農工商三個生產階級，他們用血汗換得的衣食資料，除維持自己的生活而外，尚須養活其他幾個不生活階級。他方面還有士人，官吏、兵士，和游民四個階級，他們只知消費，不知生產。農工商終歲勤勞，結果僅得一飽，士人，官吏，兵士，和游民養尊處優，不勞而獲，掌握着全國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統治權。這便是我國社會的簡略構造。

耿修業

有人以為三民主義之所以在「今天」為大家所信仰，因為它是一般的民主革命，其任務在打倒帝國主義，剷除封建餘孽。在執行這一個任務的「今天」，全國各黨派是必需服從的。但其在三民主義完成這一任務以後，還有一個最艱難，最艱鉅的經濟問題，沒有解決。用社會革命以解決經濟問題，又必需有另一個主義執行這個任務。所以有人說三民主義不是一個澈底的政治路線，而三民主義到明天不能為各黨派所擁護，乃是一件極顯然的事。

這種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在今天提出，實極危險。它

混淆是非，麻醉人民，不僅妨礙建國工作，而且有害抗戰大業的進行。我們願以極簡顯的理由，指出三民主義的確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路線，是中華民族永恆的共同的信仰。

一一

有人把三民主義當做是一般的民主革命，是因為他認為三民主義是在那個特定的帝國主義時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底產物，其使命僅僅在完成某一特定階段上的任務，這任務便是反帝反封建。這種錯誤，是由於他把三民主義，當做一個直接反應，所產生的結果，完全忽略了它的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意義與使命。

就承先說，三民主義是繼承幾千年來中國最偉大的思想，是中華民族悠久文化的結晶。戴季陶先生說過：「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子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中山先生自己也曾說：「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中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中國正統的道德思想是什麼？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把這種美德發揚光大起來，其結果便可達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以中國的思想一向主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極端憎惡那種食人自肥的黷武主義。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便特別提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

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今天的抗戰來講，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求得中國民族的獨立，還沒有完成三民主義的任務。我們還需要濟弱扶傾，從政治經濟諸方面着手，以達到大同之治。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一貫理想，所以三民主義絕不是某一個特定時代中突然生長的產物，它的任務也就不僅止停留在一個被限定的階段上。

從啓後這個意義來說，三民主義是一個發展的，進化的主義。雖然它是中國文化的遺產，它却不是一件古董。因為它又渲染了世界時代問題的色彩。蔣委員長的話說得非常扼要：「三民主義是總理憑其特殊卓絕之天資與救國救世之宏願，擷取古今中外學術思想之精華，至斟酌中國與世界之現實環境，發導其崇高闊偉之智慧而創造發明的」。所以三民主義一方面領導着時代前進，同時還永遠的適應着時代潮流。時代前進一步，三民主義的內容必有所充實與發展。這是一個偉大主義具有的特質，有人以為明天的中國，將有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思想取三民主義而代之，這完全沒有認清中國的文化淵源，更忽略三民主義的發展性。也或許有人以為，三民主義既是不斷的演變，它的將來說不定會變成某一種單純的社會主義，如馬克思主義之類，這實在是一種杞憂，雖然三民主義怎樣在改進，它絕不會失掉本質，它始終是一個救中國，救世界的主義，它的理論基礎建於中國的傳統思想上。這種經孫中山先生確定好了的理論基礎，決不會演變而為他種主義。就是所謂演進或發展，只是說三民主義的實施情形與推廣範圍，其理論的本身，當然不會有絲毫變動。

說三民主義不是澈底的革命路線的這些人，總以為三民主義的革命，只在完成民族民權的革命至於進行民生革命（社會革命）以解決民生問題，則應由另一個所謂進步的黨派去做。站在他們的立場來說，以為這是一個歷史的定則：先有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然後再有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最好的例證當然就是今天的蘇聯。三月革命是資產階級推倒沙皇的專治政權，十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傾覆克倫斯基的政府。因此，為應用這個公式，有些人便不惜稱中國國民黨是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鬥爭，却名之曰：「一般的民主革命」。於是他們更以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有了這三個條件，代進他們的「公式」，便得到，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的抗戰，一定是勝利的；但是未來的天下，則屬之於中國共產黨。這種看法，不僅是一種妄想，實在是沒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本質，更沒有澈底明瞭三民主義革命的眞精神。

中國的社會，不同於歐美尤異乎當年的帝俄，這是一件極爲明顯毋庸辨明的事實。至於說到三民主義革命的眞精神：第一是在形式上，它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革命同時進行。第二，在實質上，解決民族民權的問題，便是解決民生問題。

第一，就形式上說，必須認清三民主義的整個性。三民主義不是三個並列的主義，表現不同的方法，將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逐步解決，它是三個主義先主權把這三個

問題同時解決，也就是說，主張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革命同時進行。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的解釋中曾說：「本黨始終底最大的目的，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三種工夫，同時來做完。做完了這三種工夫，就是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達到了本黨底主義，那才算是國利民福。到了那個時候，人民才可以享真正的幸福」。

從理論上講，中國革命，必須同時進行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方能發揮偉大的力量。譬如進行民族革命，要獲得最後的勝利，必須靠兩個條件：一是政治力量，一是經濟力量。一個民族要抵抗外來帝國主義政治力的壓迫，必須加強自己民族的政治力，才能制勝帝國主義。而政治力量又往往是經濟力量的表現，經濟力量是政治力量的實質。實行民族主義便是加強人民的政治力量；民生主義實現的效果，必能充實民族的經濟力量。如果不談民權主義，或者把民生主義放在以後去解決，那根本就不能獲得民族革命的成

功。而且事實上，中國也沒有兩次革命的可能（民權與民生革命分兩次做）。中國革命是一個長期的鬥爭，革命的原則是整個的三民主義，不是一民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或別的主義。這實在是中山先生的眼光遠大，因爲他早看出社會革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但在中國却可防患於未然，就是在實行民族、民權主義時，必須兼顧民生主義，然後革命的基礎才立。一個新的中國便可出現。我們在總理遺教中看到當年中山先生對民生主義的提倡，特別致力於對民生問題的解釋，非常重視。中山先生說：「歐美

生出貧富不均的大問題，這就是社會問題。解決這問題，就是民生主義。爲什麼大總統在三十年前，研究要建設新中國的方法，必須於民族、民權兩主義之外，兼采民生主義呢？因爲這三種主義，是建設二十世紀以後的新國家的完全方法。這三種主義並行，共和基礎才能穩固。又說：「本天總統觀察世界的大勢，想到本國的情形，以爲行民族革命，同時要實行民權革命；要實行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以防患於未然。」（三民主義是建設新國家之完全方法——中山遺書）。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且不管共產主義是否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根本在三民主義的革命當中，已經早規定好了民生主義解決經濟問題，不用別人更不容別人來越俎代庖。

第二，從實質上言，必須認清三民主義的本體。三民主義既是一個主義，所以它只有一個出發點和歸宿點。這個出發點和歸宿點便是民生。三民主義的革命，便是在求全民族全人類的生存。中山先生有云：「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理，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樣看來，中山先生的全付精神，都貫注在民生主義上，民生主義實在就是三民主義的本體。所以民族、民權主義的實行，便是民生主義本身的實現。

因爲我們已公認民生是人類歷史進化的中心，所以民生受到障礙時，便是社會紛亂的根源。不過民生所受到的障礙原因各有不同，因此民生問題所表現的形式也就各異，當整

個民族受外族的壓迫而不能維持其生存的時候，民生問題，便表現爲民族問題。如果因爲國內大多數人受少數統治階級的壓迫，生存受了威脅，於是民生問題，就會表現爲政治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是民族、民權問題的實質，民族、民權問題只是民生問題所表現不同的形式。那末民生問題的解決，形式上須由民族民權問題的解決而完成，反過來說，解決民族民權的問題，實質上，便是解決民生問題。戴季陶先生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內有非常透澈的說明。他說：「先生一生的精神，全部是注在民生主義。我們就民生主義的關係來說，民族主義，是三民主義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也可以說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基礎。要達到解決民生問題的目的，便先要排除障礙民生的惡勢力。要排斥障礙民生的惡勢力，第一便先要民族自身具備一種偉大的能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地位，扶植起來。脫離帝國主義的壓迫，造成完全獨立的自由的國家。民族主義的重點，完全是在這一點。所以就民生主義說來，民族問題，實在是民生問題當中最大的一個部分。如果說普通的社會問題是橫的民生問題，這民族問題，就可以算是縱的民生問題了。民權主義是爲什麼呢？就是解決民生問題：必定要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才是正確。所以爲了解決民生問題，就非建設人民的權力不可。尤其非建設起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立於被壓迫地位的農工階級的權力不可。所以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是主張全體人民男女的普通直接民權。如此看來，我們就可曉得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最初的動因，最後的目的，都是在於民生。……民生主義，實在是三民主義的本體。三民主義並不是三個部

分，就本體上看，祇有一個民生主義，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明瞭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後，我們還能說今天的抗戰是一般的民主革命？三民主義是不澈底的政治路綫嗎？我們相信每一個善良的中國人，每一個不願做異國奴隸的同胞，切能認清只有實行三民主義，便可解決一切問題。不僅救了中國，而且救了全世界。

四

由以上所說，三民主義實在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思想的正統。單把三民主義看做是帝國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現象的反映，或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蘇俄的社會主義這時代中的必然產物，這，不是他未認清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社會；就是他別具用心，胸懷詭詐。時代不管怎樣在改變，文化總不會拋掉所會加於它的民族印號。我們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我們絕不會捨棄祖宗給我們的珍貴遺產，而作外來文化思想的奴隸。所以在抗戰建國中的今天，固然要信仰三民主義；爲了承先啓後繼往開來，就是到明天，三民主義還是全民族的

力行的理論與方法

一、人生與行

行的意義 人類生活於宇宙當中，目的在於求生，而求生就在行。所以有生就有形，有行始有生。更詳細地說：行可

共同信仰。

同時，中國革命有中國革命的特質。這個特質便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革命同時進行。在外國次第實行的結果，已經鑄成大錯。假如我們現在還希望用兩次革命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那便是蹈人覆轍。假如我們以爲三民主義革命「只是」停留在民族民權革命的階段上，那他根本模糊了三民主義革命的特質。

並且，我們還要進一步的認清今天的抗戰，並不單是求民族主義的實現，而是在排斥障礙民生的惡勢力；我們的建國，也不單是着眼於民主主義的實行，而是在建設人民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的權力，以便民生問題的解決。今天的抗戰建國，實在就是爲的解決民生問題，求民生主義的全盤實現。所以三民主義在中國是最澈底的政治路綫，就好像馬列主義在「俄國人」看來是蘇聯的最澈底的政治路綫一樣。

徘徊歧途，迷戀異國情調的人們，必須及早回頭，愛你們的祖國，珍惜祖國賦予你們的寶貴遺產，那偉大的三民主義！

張民權

說是生的歷程，生的表象，而生則是行的本體，行的終極。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就是要人取法於天體的運行，前進不已，以達到美滿生存的目的。

所謂生，不是爲個人而生的，因爲人類的進化在於互助，美滿的生存在於共榮。總裁嘗以「生活之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的生命」勉勵國人，這就是說一個人固應爲一己而生，但是尤應爲「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而生。禮記上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便是宇宙大公無私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於宇宙的進行，萬物的化育，而天理有應乎人心，在天爲「公」，在人爲「仁」。仁乃人的本性，亦即是虛靈不昧的良知。人類欲充其善端，實現他的良知，就必定要致良知。如何致良知，便是行。故 總裁說：「行爲性之表，亦即是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之人生也，是爲行而生，那麼，我們也應當爲生而行」（行的哲學）這幾句話的真義，便是要人們順天應人，把人類生有的良知，充分的發揮出來。

知行關係 人生在行，亦唯有從行的過程中，才能知得生命之真義和生活的真理，我們要明瞭這一點，必須首先了解知與行的關係，先就心性方面來說，人有純乎天理的良知，但同時也有起於物引（Attraction）的人欲。一般人的良知，不免爲物欲所蔽，故必須力行「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才能使良知實現，復歸本體。換言之，即宇宙萬事萬物之理，惟存求之於吾人自身之行，吾身能行，則精察明白的知識，自然會獲得。譬如中庸上講的成己成物，大學上講的明明德親民，我們一定要有成物的工夫才能成己，要有親民的工夫才能明明德。所以陽明先生曾說：「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會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爲知孝知弟，不

成只是談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傳習錄）由是可知有真切篤實之行，才能有明白精察之知。再就事功方面來說：一切的知，沒有不需要經過行的過程的，所以只要一個人肯力行，必然愈行愈知，而愈知則行之愈善。譬如一切科學上的發明與發現，不經過許多實驗和探索的「行之增進」的過程，能够成功嗎？這整個探索與實驗的工夫，可說是行的過程，而有所發明或有所發現，便是最後所得之真知。再如一切技術和技能，如駕駛飛機、輪船、火車甚至游泳、騎馬、射擊、歌詠，都是非經若干的練習，不能成功的，在多次練習的當中，就是行的過程，而學會了這些技能便是知之獲得。由是可見行乃是知之始，知乃是行之成。

二、知，知識與最高知識

知識的增積 真知識有從力行中才可求得，沒有行就無從得到知。一個人身體力行以後，一方面行的效果，當然表現於外界的事物之上，一方面真知灼見，也就存現於個人心理狀態之中。這種存現於個人心理狀態的知，是可以形之於語言或表之於文字的，由是一己的真知，就變成了可以流通傳播的知識。千百年來一切學問經驗的遺傳和歷史文化的交替，那是發源於這種真知的創造和記述，而人類今日所有的知識範圍，也就是這種個人真知創造、記述、累積的總和。這些知識，對於人類的貢獻是非常偉大的，他提示了人類應該努力的方向，應該採取的方法和步驟，同時他也暗示了人類所不應走的歧途和應該避免的錯誤，有了這種知識的存在，就照樣供給人類求生的方法和門徑：他可使人類的行，更

法方與論理的行方

有效率，更有條理，更能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知識與知 在這裏我們有一點必須認清的，就是世界上人類所有的現成知識，我們如果把他攝取過來，祇加以憑空的推理和想像，這並不算是個人的真知。一般文人墨客迂闊之論，固然不是知；即吾人今日探求科學上的原理，而不施之於應用，也不能算做知。總理亦曾舉日本維新之例說：「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是故日本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孫文學說第五章）照這樣說，人類求知不是沒有用處麼？如此的認識，也是不對的，第一因為人類現有的知識範圍是相當廣博的，固然這些知識比起無極的真宇宙尚屬渺小，然而在今日的文明中，人類却難於離開原有知識的啓導指示和培育而獲得新知。火車的前進，時時密接着路軌，植物的生長時時吮吸着水分和肥料的灌溉，我們不是絕對的否認離開知識獲得真知的可能性，而是相對的承認知識與知間有着密接的關係，正如前面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樣。第二因為求知知識的本身也是行，當然也能得到關於求知知識本身的真知。讀書有讀書的經驗，說話有說話的經驗，宇宙中的知識，經緯萬端，錯綜複雜，我們如何去發掘？如何去整理？如何去分析？如何去研究？這都是要從求知認的過程，才能獲得的，不過這裏所謂的知，不是關於所得知識內容的知，而是對於求知的方法和技能上的知罷了。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求知是相當重要的，一方面求得知識之後，可擴大我們開見的

範圍，以作力行時在方向上和技術上的參考；一方面從求知識的本身行為中，也可獲得關於求知識的真知。總而言之，知識是許多經驗和真理，我們為力行有效起見，不得不去尋求；但是同時吾人必須認清，知識的效用在於幫助人們力行。如果我們從開見上獲得了一些知識，便沾沾自足，當作真知，不僅欺人自欺，況且世界上也沒有這樣絕對價值的知識。——因為世界上沒有那一種知識，其價值不受時間性和空間性的限制的。所以我們固然要不斷的増加知識，但是我們尤應把已得的知識施之實踐，從實踐中認識他們的真正價值，從實踐中發現更高更大的真理，這才沒有失去求知識的本意。揚雄曾說：「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成無焉，為衆人。」（法言）這幾句話便是深切地說明這種道理。

最高知識·先知先覺的總理，根據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和當今全世界的潮流，融合古今中外的知識，創立了全世界最偉大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中，雖然包含了若干未經證驗的理想，可是全部主義的精華，都是總理數十年來從事革命所「體驗」與「經歷」之結果，三民主義不僅是總理個人真知的紀述，并且他是一部指示人類向前行進的計劃，三民主義的最終目的，在「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也就是要達於「仁」的極致。古人說：「其仁如天，合和萬邦。」可見三民主義的理想，實欲與天地合一，因此他是人類的指導知識或最高知識。

真誠的信仰 三民主義是唯一救世界救人類的真理，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甚至全世界的人類，都是應該信仰的。但

是我們僅僅從書本上傳單上口頭上了解他的一些粗淺大意，是不能够算做真知主義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主義，革命就在力行，我們要認清主義的真知，發生於對於主義的實行；所以革命黨員，除了力行，便無工作。孔子的弟子顏淵，不努力於踐行孔子之道，何能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景仰？革命黨員不盡力於推行三民主義，又何能真正驗知主義之偉大性呢？現在有人高言信仰主義，而實則懷疑揣測不知所安，或者藉此欺世盜名倒行逆施者，都是未能真實按着主義實行的原故。

三、知難行易

力行的要旨，我們在上面已經簡略地說明了。但吾人必須篤信 總理行易知難的學說，行易知難的學說，實在就是力行的學說，因為力行之效是從「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認識上出發的。所謂「能知必能行」 總理就是勉人去求知，而其知只有從力行中獲得，故即是叫人去力行。至於「不知亦能行」，語意更為明顯，因為真知既會從力行中獲得，則人們又何必躊躇徘徊於「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前呢？

不行不能知 知為什麼是難呢？因為一切的真知必須經過行的階段，除了行而外得不到真知，這是「行」與「知」在發展的進程上分出一易一難的主要原因。總裁曾說：「凡是我們學問經驗中認為已經獲得的知識，如果不經過實行而證明有效，就不能斷定所知者果為真知，所以我們一切的事業，必須實行而後始有真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如

果經過實行或實驗以後，而我們所得的知識，所用時方法，證明如不能見效，我們就可察覺從前所認為已知者，其實不是真知」，（行的哲學）所以一切的知識，不經過自己的行，知識儘管是知識，自己真知與否，却是另外一事，譬如中學生能熟讀許多幾何定理而不能證明問題，老冬烘嘗涉獵羣經而不能治理小事；又如醫者能呼黑白之名，而不能辨黑白之物，世人能言鬼神之事，而不知鬼神之所在，像這等「不行不能知」的例，真是不勝枚舉。總理會舉飲食、用錢、作文、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事，以證明求得其真知之難，人類常把一知半解的理論或知識，視為真知，其實真知是離不了行的。

靈明的覺性 再進一步說，力行固可創造真知，但是真知不能獲得，尚需要力行在自己運用他天賦的靈明的覺性。這種覺性，多半是在行為到了相當的階段而顯著發生。人們運用此種「覺性」，就能發生一種新的認識，這就是真知。所以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弗思則弗得也。」（告子上）又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全前）歷史上有許多的事物，能從一生的行為中，體驗出人生之至義和宇宙的真理。同樣也有許多人渾渾噩噩冥行終世而茫無所知。世界上之所以有聖賢豪傑俗子凡夫之分，就是在此。比方我們天天飲食，如何不知飲食之道？天天用錢，如何不明用錢之理？這便是因為大家不能夠運用他們的「覺性」的原故。人們未有不看過煮水時的蒸氣，可是瓦特 (J. Watt) 看見了便發明蒸汽機；人們未有不看見過果實落地的，可是牛頓 (S. I. Newton) 看見

了、就發明了萬有引力。所以僅是一味地去行，而不注意行的進程中所顯現的各種景象，所啓示的各種靈機，加以省察或反想的工夫，則所得的新知，依然是有限的。有時即使加了這種省察或反想的工夫，還不能得到新知。由此可見「知之難了」。

不知亦能行。行為什麼是易呢？行是自然的。是不學而能的。人類不知而行的例，非常衆多。從心理學上的研究，我們知道有所謂本能的動作 (Instinctive Action) 反射的動作 (Reflex) 習慣 (Habits) 下意识 (Sub-Consciousness) 等等，都是不知而行的。譬如嬰兒飲乳，觸火退縮，聞樂而舞，見虎而逃，夢遊等，便是這類動作的具體事例。再講到人類的進化，無論在社會生活方面的演進，或者，在生存工具上的創造，多半是由于不知而行得來的。總理會說：「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未練習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事也，乃文明之動機也。」(孫文學說第七章)由此看來，不知而行不僅是人類求生存之要道，而且爲人類所皆能。所以「行」是沒有什麼難處的。

行的原動力。再次，行是自發的，自動的。我們要知道行的力量必先分清行與動不同。行是人性的發揚，出於人類的自發和自覺。有生命的原動力才誠然在內中推動，所以是主動的，經常的。抽動則是產生於外界的引力或刺激，是被動的，時作時止的。固然行也有動有靜，但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行是沒有「動」停止的。所以中庸上說「君子居則觀象象，不遷則久」這道前進不已，永久不息的精神，便是一「誠」所發生的動力。中庸上說「一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參天地之化育，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矣。」所以有了誠的力量，就能衝破難關，剷除荆棘，處危若安，履險如夷，充其極乃至於「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覺「甘之如飴」了。行的人生，服務的人生，都是由這一點出發。總裁說：「知之出乎誠者必智，行之出乎誠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篤，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斷無不成。」(行的哲學)固然天所賦與人類的聰明才力有不齊，有些人「生知安行」，有些「學知利行」，有些人「困知勉行」，但是只要人人有真誠熱誠去行，則顯赫的功勳，彪炳的德行，及內心精察明白的真知，是同樣的會獲得的。

四、怎樣去行

人類爲了實現人生本務，爲了不斷地擴大宇宙知識的範圍，和增進生存的幸福，凡是一個圓顛方趾的人，無論職務大小，地位高低，都需要努力去行。但是怎樣去行呢？這就不得不尋求行的知識，講行的方法了。

行的目的。行的第一要點，就是行要有行的目的。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一切行的目的，皆在「行仁」。「知仁」，但是行仁知仁乃是我們的總目的，並且「仁」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日常行爲的目的，乃是要求他的具體實現，譬如我們此次抗戰，固在行仁，但驅除倭寇，收復失土，則是此次抗戰的具體目的，故「仁」的目的是概括的，貫通人類一切行爲的；而人類某項特定行爲之目的，只是指該項行爲本身

的具體目的，但是這等目的，是不能離開總目的而存在的。我們知道，目的越人類行為所追求的客體，客體的實現，就是行為的成功。力行之時，有了目的的確立，在客觀的意義上，就可認清工作的對象，辨別工作的方向，不致走入歧途，混亂工作的步驟；在主觀的意義上，就可堅定個人的意志，集中個人的精力，爲着預期的目的而努力，不達目的，誓不中止。

行的程序，行的第二要點，就是行要有行的程序，我們無論開始某項工作，或求某種目的之實現，決不能一蹴而躋。我們知道行是有系統的活動，在其行的過程中，是可以分出許多階段的，各階段的先後緩急，銜接補充，都有一定的法則；低階段向高階段前進，低程度向高程度擴充，都有一定的範疇；這整個的自然行進的過程，就構成了有系統的「行的程序」。在這行的程序當中，我們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行的起點，第二要注意的就是行的順序，前者是決定程序如何開始，後者是決定程序如何進行。所謂起點，從縱的關係言，要由卑而高，由淺而深；從橫的關係言，要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所謂卑、淺、近、內，都是行的着手點，譬如儒家講愛，要由親及疎，推己及人，這便是行仁的入手方法，而墨家則講「兼愛」，父子與路人同視，便有沒有起點了，所謂順序，就是進行的步驟和計劃，我們無論做何種工作，必須按部就班，穩實前進，決不容有「揠苗助長」或超越躍進的情形，而每一步驟之實施，都必需有每一步驟之計劃。古

夫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又說：「行道必先修德。」所謂「豫」，「修德」，便是準備的工作，也就是計劃的工作。

行的恆久性，行的第三要點，就是行是具有恆久性的。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又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這種前進不已，晝夜不息的精神，便是行的真精神，力行是平實的「庸德之行」，不誇張，不懈怠，在正軌上充滿着生命氣象的前進，所以他是經常的，恆久的。一切的行，既有發端而無計劃，祇有計劃而無工夫，都是不能成功的。「恆」是力行惟一成功之要素，有了恆心去行，工作一開始，已因伏下最後成功的種因，所以天下事，只有至誠專一，夙夜匪懈，遇失敗不灰心，遇阻撓不中止，堅實前進，才能獲得最終的成功。

成功的道路，總上所述，我們應該知道行是創造一切的。人類力行以後，一方面能創造出事物，表現在客觀的外在的事實，一方面能創造新知，顯現在主觀的內在的心理。由於前者的結果，產生了價值和道德，提高人類生存的幸福和意義；由於後者的結果，產生了真知或知識，指示了人類求生的方法和門徑。我們生在宇宙當中，應該不斷的力行，不斷的求知；同時在行的過程中，又必需本着最高信仰，抱着最大熱誠，按着既定方針，努力邁進，持之以恆，然後方能實現人生本務，完成時代使命！

「知難行易」學說的研究

項維漢

(一) 前言

作革命鬥爭必要有革命信仰，因為信仰即是力量，有力量而後始能從事於革命鬥爭。所謂革命信仰，就是革命的主義。每個從事於革命鬥爭者，自必要認識其革命的主義與所負的使命，如是始有成仁取義不畏萬難的精神，來為革命事業而奮鬥。

總理的三民主義。是我們奮鬥而要求達到的最高的理想，他指明了我們奮鬥的目標，確立了我們鬥爭的途徑。至於幫助我們認識革命主義與使命，並決定我們對革命主義與使命的態度，則更有其一「知難行易」學說。這個學說。在心理上加強我們鬥爭的勇氣，規劃我們實踐的方法。所以總裁說：「孫文學說這部書，是總理最根本的革命學問，亦即我們革命最緊要的心理基礎。」從事於革命鬥爭者，必先要有對此學說之認識與修養，即所謂革命必先革心，然後方可擔負起革命的重任！

(二) 過去知行學說的批判

我國過去講知行學說者本甚多，但要而言之，可分下列三派。

第一派以程伊川、朱海庵、陳北溪三人為代表，程伊川說：「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強行之，安能持久。除非燭理

明，自然樂循理，」又說，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又云，「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知之必至，無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

朱海庵說：「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來如何履踐，也只是空。」「義理不明，如何履踐？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

陳北溪說：「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着力去做，不是截然二事；先致知，然後力行，只是一套的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為知之至，而行之力即在其中矣。」

由上觀之，可知他們都以為知在行的先，雖然他們不忽視行的重要，但皆主張致知而後力行，且以知為主腦，然「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待知而後行，是以終身必無行的時候，泛濫無歸宿，空僞不着實，是其必然的流弊。因伊川與北溪主張知之深，必能行，故衍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

第二即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陽明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他引太學中書

話來說明「知行合一」的理論說：「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可知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以爲凡人一有某種感覺，即發生某種反應作用，並且有感覺必有反應，無反應必無感覺，感覺與反應之間，是毫不隔離毫無障礙的，感覺屬知，反應屬行，故謂「知行合一」。不過此學說則又建築在他所謂的心即理上。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也。」總理對此學說的批評，第一是「以經濟學分工專業之理。」謂「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第二陽明學說，「以難爲易，以易爲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和反。」同時只求理於吾心，是不免流於束書不觀而專尋頓悟，故陸隴其指其流弊謂：「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誠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不過在宋學末流之時，此學說亦頗能鼓起人履踐的精神，即就王陽明本人言之，他即是第三不朽之業於一身者，所以總裁亦不完全否認此學說的價值。

第三爲顏李的學說。顏習齋與李恕谷的格物論，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所以他們不僅反對讀書以致知，同時也反對著書。顏習齋說：「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李恕谷說：「窮理的閱歷多，則世事的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

明之亡，此物此志也。」他們以爲理在事中，欲知理，必盡事。顏習齋說：「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請問能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搥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他們是宋學的大反動，博學，主靜，居敬都是他們所反對的。總之，他們以理存於事，行以求知，「所學即是所用，所用即是所學。」（李恕谷語）把學問與人生打成一片，雖然他們似太忽略了書本的價值，但是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實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是有他們的燦爛光明的地位。

（三）總理知行學說的要義

「以行而求知，因知而進行。」可概括全篇學說的要義，總理對於知所下的定義曰：「夫科學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除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特識也。」所以總理所說的知與陽明所說的知在本質上是大大不相同，陽明所謂的良知，是不由見聞而有，總理所說的是真知特識，則必待見聞而後有，故他的致知工夫是「以行而求知。」他說：「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之四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所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習練、試驗、冒險與探索，皆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換言之，即是「以行而求知。」知既至，則必更進於行以履踐之，且能知必能行，」他說：「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想像，從意

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器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樂成者也。

「以行而求知，因知而進行。」其所以「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者，乃總理認清了知行進展的原理，他說：「其始則不知而行之，其繼則行之而後知之，其終則因已知而更進於行。」由此可知行是在知之先，知與行是一連串的不斷時向前進展。行的成績便是知，同時知的作用也可以幫助行、指導、改善行。就知行的進展上看，似有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的三個階段，但那是絕不可分離的。在某階段看是行，至某階段則又是知，知行決不是截然兩事。陳北溪謂：「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李恕谷謂：「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似可作知行進展的註腳。

程朱等主知而後行，但天下的事理無窮，人生的歲月有限，故使人終身無履踐的機會。李顏主以行求知，在另一方面似忽略了知的主導作用，故亦不免狹隘。總理主「以行而求知」，「行一點，知一點，故不流於泛濫空僞。主「因知而進行」，「知一點，行一點，亦不忽視知的主導作用。因為復興中華民族，總理在民族主義中說：「除了恢復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學歐美的長處，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此更是藉他人之知以進行，而「迎頭趕上」。故總理的知行學說，是集程朱顏李兩派之長。知行緊接發動則又有陽明「知行合一」之意，而在知行的本質上則更有其獨特的見解。

(四)「知難行易」與革命鬥爭

心理現象是行為的基礎，幾千年來的「知之匪艱，行之唯艱」的迷信，造成了國人萎靡頹惰苟安畏難的心理。當總理要施行革命建設的時候，一般人都以其理想太高。知易行難，「衆口鑠金，一時風靡」，所以總理說：「嗚呼！此說者，予生平之最大敵也！」「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故「知之匪艱，行之唯艱」的迷信，是消沉了革命奮鬥的精神，阻礙了革命建設的事業。但爲了「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故總理乃「先作學說，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也。」由此便可知「知難行易」與革命鬥爭的關係。

「知難行易」的證明。是基於知行進展知在行先的理論。因爲「人類之進化，皆發軔於不知而行。」人既能行而不知，行所不知，不知既能行，知之則必更易行，故曰知難而行易，即其所舉的十大證例，亦爲此理，如飲食用錢之類，即爲不知而行之者；如古代沒有化學，而先有豆腐瓷器等化學品，則爲行而後知者；現代化學，工程學，電學之類，則爲知而後行者。事功上如此，心性上亦如此。總理說：「孟子盡心章曰：行之而不著焉，習之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正指心性而言也。」明白了「知難行易爲宇宙中不易的真理，我們當掃盡「知之匪艱，行之唯艱」的舊迷信，而建立「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的新信仰。

「能知必能行，」用之於革命鬥爭，是在說明革命理論之必能實現。總理的革命方略，是合乎事實所需要的崇高遠大的理想，不是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的幻想。他說：「予之革命建設也，本世界進化之潮流，循各國已行之先例，鑑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籌之有素，而後訂為革命方略，所以總理的革命理論，一方面是從他本人革命奮鬥中得來，同時更證之於世界革命所行的結果。換言之，即皆是由實行中得來。由行而來的知是真知，故「能知必能行。」

所謂「不知亦能行，」並不是冥行妄作的盲動主義，總理說：「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其一先知先覺者，即發明家也；其二後知後覺者，即鼓吹家也；其三不知不覺者，即實行家也。」在每個時代裏都是有此三系之人，先知先覺者，便是領導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者去履踐的領袖，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因為有先知先覺者的領導，故「不知亦能行。」

先知先覺者領導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去履踐的理論，並不是教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者去盲從先知先覺者，去作先知先覺者的工具。我們應知道，一個民族應把他看作一個有機體，個人之於民族，猶之細胞之於身體，一單獨的細胞不能離身體而獨立存在，同時單獨的個人亦不能離民族而獨立存在，一民族之有先知先覺者，後知後覺者與不知不覺者

，亦猶之如一人由許多細胞集合組成各稱不同的官能以各司其用一樣。一人健全，是繫於各細胞的健全，一民族的強盛，亦繫於此三系之人相需為用，故總理說：「有此三系之人相需為用，則大禹之九河可疏，秦皇之長城可築也。」

「知難行易」，是每個從事於革命鬥爭者應有的認識，所以總裁說：「我們的哲學，唯認知難行易為唯一的人生哲學。」

(五) 結論

若以總理的民生哲學為本體論，則「知難行易」學便是認識論，同時也是實現革命主義的方法論。中華民族的消沉，即在「沒有堅決的信仰去篤行的緣故」。總理的學說，是以力行為中心而建立的，因為知行都是生命的需要所得來，知行的進展便是人類的進化。總裁更光大之而為力行哲學，說明力行在宇宙與人生的道理與價值，在抗戰建國的今天，此學說的重要性是無庸說明，我們且以總裁的話來作結論。總裁說：「知之匪艱行之唯艱只是對於空疏怠惰的惡習慣的一句箴言，而行之匪艱却是我們民族普遍認識的真理。所以我們以後革命立業，無論抗戰，無論建國，只要下定決心，只要抱着熱誠，只要照着我們信仰去力行，我敢斷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而我們的革命的使命，必能容易達到，亦就可不言而喻了。」

現代經濟組織的新動向

楊覺農

歐洲自十八世紀中葉產業革命發生以後，機器工業代手工業而興起，在經濟史上開創了燦爛的紀錄。近二百年來，復因物質科學的突飛猛進，機器生產的技術更是日新月異。在貨物的生產上，不但數量方面較以前增加了幾千百倍，在質量上也是精美無比，巧奪天工。然而這種機械的大量生產，却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某種人的幸福雖是日有增進，但是這種人的數目却逐漸地在減少；某種人的痛苦是日益深劇，而且這種人的數目又逐漸的在增多。換句話說，少數的人雖然享受着空前未有的幸福，然而大多數的人却忍受着空前未有的痛苦，所以就全體看來，民生問題是到了空前未有的嚴重程度。

但是我們必得要認清，這種嚴重的局面不能武斷的歸咎於機器生產，因為機器生產不過是一種經濟上的動力，而動力本身無所謂功過；而指導這動力向自由放任的方向前進的個人主義哲學，却是現代經濟社會一切罪惡的淵源。

原來個人主義的思想是重農學派的社會哲學，中間經過重商主義時代，曾經一度消沉，到亞丹斯密(Adam Smith)時代又開始復活，且較奎斯內(Quesnay)杜果(Turgot)諸人更能發揚光大，他們最信賴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以為是經濟界唯一的法則；以為人們只要任憑個人的欲望和理想自然的做去，不但個人因此而得福，即社會也同蒙其利。這種學說是建築在兩個基本的假定上面的，第一是各人的經

濟活動都是以利己心為出發的，也就是亞丹斯密所謂「各人皆有改善其生活的願望」。第二是個人的利害只有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所謂「自己是最好的判斷者」。既然各人都有改善其生活的願望，同時自己又是最好的判斷者，那末，依個人自己的判斷去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當然能得到最大的效益；同時因為公私利害的一致，所以社會也同受其惠。亞丹斯密不但是單純的指出公私利害趨於一致，並且從分工的發生，貨幣的應用，資本的累積，價格的作用，人口的增減，貨幣的供求，投資的方向，種種現象，以證明經濟制度純粹起於自然，也就是說，這種種經濟制度的發生，並不是人類先知道他的功效而創立的，而是受利己心的趨使，於冥冥之中自然而發展成功的。這種自利心的活動，結果却帶來了全體社會的幸福，因此我們要想增進人類的經濟幸福，就無須對於個人的經濟活動加以干涉與指導，社會對於個人只要在政治上做到「保障安民」的地步，在經濟上用不着負任何的責任；所謂「最好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The Laziest Government is the best Government)，自然的「無形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已經將一切都安排好了。

在自由放任的個人主義的思想指導之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便從此展開了。先就生產來說，隨着機械的逐漸發明，不但在生產的質量方向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同時生產的場所也由家庭而變為工廠，手工業的主人變成為工資勞動者，

於是生產關係也隨之而有劇烈的變動。這種以工廠制度為基礎的生產能力，並無人為的力量來指導他的活動，而是任其自然的向「大利益所在」的地方前進，這裏面絲毫沒有人道與倫理的意味在內，純粹是機械的自然的作。

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之下，生產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較多的利潤，所以他生產的數量和質量是完全不顧一般人民的需求，而是依市場上有效的需求（不是單純的有需求的慾望，而是有購買能力的需求）為準則的。換句話說，生產者生產什麼東西，生產多少東西，在事先所注意的不是這種東西是否為人民所需要，需要多少的問題，而是這種東西在市場上有没有人買，有多少人要買的問題。在這種生產關係之下，生產是與社會上消費的慾望脫離關係的，而是與社會上有購買力的需求緊緊的聯繫起來的。其結果，生產雖多，但是對於購買力低落的一般人民，無異「海上仙山，有可望而不可接」之嘆了。

不但生產方面是完全為個人的利益而進行，就是分配也同樣沒有一種超越個人的組織來通盤籌劃，而是賴貨物與貨幣的交換而進行的。交換的準則便是價格。各人對於社會財貨的支配力或佔有力量要看他自己所有的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而定，而他所有的購買力的大小，是要看他自己所參與的生產事業中所生產的貨物價格的高低以為斷。假如製造某種物品的時候，原料的價格漲，若其他的情形不變，那末原料生產者的購買力會相對的提高，從而依交換的結果，他們對於社會財貨的支配力或佔有力也就增大，就是通常所謂他們能獲得較多的貨物，享受較大的經濟幸福。再就一般的消費情

形來看，我們所購買的貨物，不見得能適應我們理想的需要，或者因為數量太少，或者因為質量太差，甚至根本無力購買，這是為什麼？這不是因為受了價格的制限嗎？平常除了少數消費彈性很缺乏的物品以外，我們的消費顯然的大有引縮的餘地。而伸縮的關鍵便是價格的高低。所謂有效的需求，就是具有付這價格的能方的購買慾望。由此可知，在分配的過程之中，也和生產一樣，並不加任何有意識的管制，只是任從價格在冥冥之中決定一切。

這種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的經濟社會，一切都以自由放任為原則，生產者但向利益的豐蓄，不計需要的多寡，引成一種極度無政府的状态；那末所謂生產過剩，工廠倒閉，以及各部門產業之間的畸形發展，自然紛至沓來，而商業循環便變成不可逃避的命運了。在分配方面，因為是以交換為手段，以價格為中心，所以經濟幸福的享受，完全決定於購買能力的大小，因此失業問題，勞資糾紛又是層見迭出，所以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竭力在生產上實施產業合理化運動，以期增加財產利用的效能，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衝突和浪費，減低貨物的成本，以暫時緩補這整個經濟的日漸擴大的破綻，但是結果呢？在這經濟社會的指導原則還沒有改變的時候，當消費者的購買力沒有新的增進或甚至減少的時候，產業合理化運動決無補救弊的作用，充其量，也不過是生產方面比前此經濟一點吧了。

隨着社會問題的日益嚴重，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似已到了「窮」的地步，那末當然需要「變」，然後才能「通」。由舊的經濟組織演進為新的經濟組織，他的指導原則，

必須由社會本位的思想來代替個人主義的思想，由計劃管制的方法來代替自由放任的作風。這樣，才是根本的改造而不是枝節的補救。

所謂社會本位的思想，就是社會對於個人的參加經濟活動，爲了社會全體福利，應當加以嚴格的統制和完密的指導，使每一經濟人都成爲整個經濟機構的一分子，參加整個經濟活動的部分工作。在這裏，個人應該不是一個具有充分自由獨立性的經濟活動的主人，而是在共同的主人——社會——指揮下的參加工作的成員。退一步說，即使「社會」的意味沒有那麼濃厚，至少每一個人的經濟活動，應該在社會指導之下進行，消極的不妨害社會全體的福利。一方面社會對於個人的活動加以管制，另一方面每一個參加經濟活動的成員，社會對他也負相當的責任，使其經濟幸福的享受，得以相當的滿足，這情形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組織完全異趣。

因爲社會對於個人的參加經濟活動，爲了社會全體的福利，要加以嚴格的統制與完密的指導，所以生產並不是爲了增加個人的利潤，而是爲了增進社會全體的福利；不是自由放任的政府狀態，而是計劃管制的有意識的組織。分配也不藉價格的機構而進行，而是人為的加以統籌支配。（雖然在目前，分配還完全脫離價格機構，似乎時機還未成熟，不過在實施計劃經濟的時候，價格當不占重要的地位，也許由統制的價格來代替他。）這樣，在全體福利的前提下，社會就可斟酌實際的環境，以「養生」爲依據，來決定要生產些什麼，生產多少，每人消費多少，消費什麼。生產既以

「養生」爲其確定的目標，自然能滿足人民的需要，不問購買力的或多或少。分配既有國家公定的辦法，不以價格高低而轉移。如是生產消費當然能互相適應，所謂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現象將永遠絕跡。

總之，我們認定個人的利益不一定與社會的利益相「致」，個人的利益應當爲社會全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應該爲社會而存在，社會不應當爲個人而存在。社會全體有福利，個人才有福利之可言，假如要犧牲社會的福利以追求個人的福利，這種福利縱能獲得，在本質上講是不真實的（Not real）在時間上講也是不久遠的（Not eternal）。而且更增進全體的福利，不是個人單獨所能做到的，而是要社會集體的力量才能完成使命的；個人只有「助成」的作用，社會才有「主持」的能力，個人只有在社會指導之下，努力奮鬥，生產建設，才能享受安甯幸福的生活。在這種社會本位的思想指導之下，我們的經濟組織，是別具一格的。生產與分配都不是任其自然的，自然秩序根本失去其存在的價值，一切活動，不在冥冥之中進行，而是有目的有計劃的在進行。爲了明白這種經濟組織的本質起見，我們不妨提出幾個要點：第一從目的上講，是社會的本位，爲的是增進社會全體的經濟福利（Economic Welfare），而非爲了增加個人的利潤。第二以形態上講是用國家集體的計畫以經營，即有個人的自主經營，也必在國家嚴格的管制之下，與完全以個別生產者的獨立經營完全不同。第三從方法上講，是有意識有計劃的經營，而不是無政府狀態的經營。第四從結果上講，是生產與消費密切的適應，人人各得其所，各遂其生，生產無過剩之

虞，消費無不足之感。這就是將來合理的經濟組織所具備的特徵。

但是我們在此地應該認識，經濟組織的構成並不是一朝一夕間的事，所以他的轉變也不是可以一蹴而躡的。很顯然的，經濟組織的構成，不但有他地理和物質的因素，也有着歷史和心理的基礎。心理上的習慣，既不能頃刻之間可以完全祛除，新的適應也非吃吃之閒可以養成，歷史的根源是無法一刀斬斷的。我們深深的相信，內容非常錯綜複雜，歷史淵源根深蒂固的現代經濟組織，我們決不能藉一紙命令，將他完全廢棄，更不純憑法律的權威，以完成新的理想，當蘇俄社會革命成功之初，大家都很想把社會主義的理想立刻實現，用很操切的方法，一道命令變更這整個的經濟制度，結果弄得生產銳減，農民暴動，不惟人民生活毫無改進，且窮困顛沛反較帝俄時代為甚。這種慘痛的教訓，使蘇俄不得不改變路線，採取新經濟政策。這種轉變正可以說明經濟組織

的改造，決不能憑少數人「靈機一動」，就可以「如願以償」的。因此，我們不但要認清現代經濟組織應該向社會本位的方向演進，並且要把握住用和平漸進的方法來改造，這是民生主義昭示我們的真理，也是歷史告訴我們的教訓。

末了，我們要談談經濟組織轉變的時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要想樹立一種社會本位的經濟組織，必然會發生相當的變動，忍受不少的痛苦，這是迫不得已的，否則，任資本主義定會沒落。正好像患重病的人必得要吃藥一樣，藥雖然苦，但是非吃不可，而在像中國那樣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國家，要想樹立一社會本位的經濟組織，是一件比較容易的工作，祇要依據我們建國的寶典——民生主義的方針，認清了社會本位的目標，用國家集體的力量，和平漸進的方法以確立新的生產分配關係，就能達到理想的成功。這正是經濟組織轉變最適宜的時機！

經濟史觀的批判

沈宗執

一 極端派底經濟史觀

經濟史觀，普通常稱為唯物史觀或歷史的唯物論；但是，後面的兩個名稱却沒有前面一個名稱更切合牠底內容。不論經濟史觀中的極端派也好，修正派也好，他們總是指經濟

因子才是歷史底決定的力量，或主要的力量，經濟因子固然是「物」（照唯物論的看法），但是，「物」不一定就是經濟因子。所以用唯物史觀，或歷史的唯物論這兩個名稱，未免有超過了牠底真實的內容的危險。

經濟史觀各入底解釋很有出入，但是，大概可以分做極

端派和修正派兩大類。現在先來討論極端派底經濟史觀。

所謂極端派底經濟史觀，和修正派底經濟史觀，根本的分歧點，是前者認為經濟因子是獨立的、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而後者認為經濟因子不是獨立的、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而不過是最重要的力量罷了。

極端派底經濟因子，不包括地理環境，因為地理環境雖然是歷史發展底經常的必需的條件之一，但牠不是歷史發展的決定條件；「因為地理環境之多少重大的變化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的社會制度的極重大變化有幾百或千餘年已經够了。」同樣，人口的增加亦沒有決定的影響。那末，什麼是極端派底經濟因子呢？換句話說什麼是獨立的、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呢？這就是生產方法；「人類隨着生產方法的改變，改變他們一切的社會關係。手磨時代造成有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氣機時代造成有工業資本家的社會。」所謂生產方法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牠是永遠變化和發展的，而「牠的變化和發展永遠是開始於生產力的變化與發展。」所以生產關係是依存於生產力，而且這依存的過程需要經過衝突；「物質生產力發達至一定時期，即與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在法律，即與當時財產關係發生衝突。」而生產力看做離開人的意識獨立存在的自動的力量。所以「生產關係適合着他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在上的真實基礎，而社會意識的一定形式就適合於這上層建築。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一般地規定着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

決定他們的意識。」這就是極端派經濟史觀的輪廓。

極端派底經濟史觀的哲學基礎是辯證法唯物論。要進一步地瞭解極端派底經濟史觀需要瞭解辯證法唯物論；要批判極端派底經濟史觀亦要從辯證法唯物論批判起。

辯證法唯物論底中心是：「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社會，而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這就是承認外界，承認客體的獨立性，承認意識對於存在的依賴關係，承認物質世界和承認物質底基源性。什麼是物質？物質就是「作用於吾人之感覺機官而引起吾人之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所得感覺的客體的實體。」「世界上只有物質和它底各種表現。主體自身也是物質的。」關於物質底性質，辯證法底唯物論者提出物質自動論，就是：「物質是運動的物質。」而且這種運動不祇是機械的運動，而尚有質的轉化。關於認識問題，辯證法唯物論者提出反映論，就是一切認識不過是客體在主體面前的反映；「客觀的真理不依靠主體而獨立存在的，雖然它反映在我們底感覺和概念中不是一下子就取完成的形態，可是人類的意識能够在認識過程中反映這種真理，認識這種真理。」這就是說，這種反映為矛盾的辯證的過程，即隨着人類底進步使反映得更完全。「我們只能在我們底時代條件之下去認識，並且只能認識這些條件允許的那麼多。」

辯證法唯物論受批評的地方，第一是牠底唯物論，第二是牠底辯證法則。

唯物論和唯心論一樣，他們對於意識和存在這問題底提法是誰決定誰。這樣的提法是根本錯誤的！存在離開了意識

是「無知」，是「無物」。意識離開了存在是空無所有。在認識底範圍以內，意識和存在是不可分的，牠們不過是一個整體底兩面。沒有存在不是意識中的存在；亦沒有意識不是拿存在做內容！說存在離意識而獨立，或意識決定存在，同樣是玄學上的遊戲！唯物論在這一點上的錯誤，是說存在決定意識，因此，極端派經濟史觀在這一點的錯誤，是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社會關係，而生產力底發展被看做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的、物質自動的結果。精神和物質（意識和存在）既然不可分離，所以生產力底發展被看做離人意識而獨立的、物質自動的結果，也是錯誤！實在，生產力底發展是精神和物質的統一——生產力底發展被看做離人美的生的結果！而且生產力雖然影響社會關係，却不是決定的條件：一切社會關係的動力是追求更美的生的衝動，而除了經濟的——這是生產力所決定的——基本欲望外，還有兩性的基本欲望；而且除了這二種基本的欲望外，還要滿足更高的欲望——真、善、美底追求。使這許多欲望得到綜合的最大可能的滿足——得到最大可能的美的生，才是社會關係底決定力量，才是社會發展底原動力！但是有一點，就是在最窮困的社會中，只能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目前的生活，然後，經濟的欲望才是比較重要的欲望，生產方法才是使定社會關係的重要因素。但是，這樣的社會是否曾經在世界上存在過却是問題，而且即使有這樣的社會，祇要牠把這種情形保持一個相當的時期，就必然地自己消滅！

第二是對於辯證法則底批評。唯物論者認為「物質是運動的物質」；但是唯生論者認為「生就是運動」，辯證法唯

物論者心目中底運動是辯證的過程，也就是對立統一的過程；但是唯生論者底運動觀却是一直線的向上過程，也就是一直線的追求更美的生底運動中，也許不免有向下的運動，但這是反動，是運動法則中底病態，隨着人類（生底高級形態）底進步，必能更有力地克服這種反動；而且必定要克服這種反動，才能使這追求更美的生底運動順利進行，才能得到最大可能的更美的生！辯證法則中底對立的統一這根本法則，換句話說，就是把這種病態看做「常態」把這種反動看做「革命」！極端派經濟史觀在這一點上的錯誤，就是把生活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看做必然，把階級鬥爭看做「革命」！而實在階級鬥爭却是追求更美的生底運動中底反動！而且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祇有在生產關係——無庸說社會關係硬化的社會中才有可能。而所謂社會關係底硬化，就是因為社會中缺少生底衝動。人類底進步就是達到更高一級的生，對於更美的生底追求更加覺悟，更加努力。因此，在進步的社會中生底衝動特別有力，社會關係或生產關係底硬化不會發生，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底衝突亦變成不可能了！

二 修正派底經濟史觀

因為極端派底經濟史觀和事實相去太遠，引起各方面的攻擊，所以就有許多人出來修正，這些人我們統稱之為修正派。修正派不敢再說經濟因子是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了，而祇說經濟因子是重要的力量；不敢再說經濟因子是獨立的，而承認各種因子底相互影響了。這是修正派比極端派進步的地方。但是，因為祇是「修正」，所以不論在事實上和

理論上仍舊有許多困難的地方！現在我們拿美國經濟學家塞利格曼（Edwin R. A. Seligman）作為代表，來對修正派底經濟史觀加以簡略的說明和批評。

塞利格曼認為極端派底經濟史觀並不是馬克斯恩格斯底真意，而不過是狂妄者底鼓吹。他根據恩格斯晚年的意見，而改變了對於經濟史觀的看法。恩格斯說：「青年人有時候對於經濟方面太注意，馬克斯和我對於這件事情是要負一部份的責任的。我們所主張的唯物史觀的原則，世人多不承認，所以我們爲辯駁反對者的攻擊，不得不極力主張。經濟以外，還有各種要素，相互之間各受影響，我們早就承認了。不過因爲沒有工夫、地方或者機會，所以沒有提到。」又說：「照唯物史觀講來，歷史中最有關係的元素是實際生命的產生和再生。過乎此者，馬克斯和我都沒有說過。但是如果有人牽強附會的說經濟元素是唯一的分子，他把這句話就弄成一句無意識，空虛，不近情理的話了。經濟情形是基礎，而基礎上的構造之各種成分——階級戰爭的政治形式，結果，和組織；法律之形式，各階人民腦海中對於這些戰爭的反映；各種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學說，與宗教的觀念，對於歷史上各種競爭的發達都有影響，並且有時還決定這些競爭的樣式。」所以在塞利格曼看來，經濟史觀不過說經濟因子是歷史中的重要因子，而不是唯一的因子，且這重要因子還受其他因子底影響。塞利格曼還指出恩格斯所說底經濟因子不但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並且還包括地理基礎和種族。

「所以正確的經濟史觀一點也不能否認或縮減歷史上倫理的和精神勢力的重要。」一切社會生產不是別的，乃是經濟

生活的反映，但是這樣的話決定不能成立。……因爲經濟祇說到社會關係的一種，而殊不知世界有多少社會需要，就有多少社會關係。」話雖如此，但是塞利格曼仍舊爲經濟史觀是唯一的、重要的歷史觀。因爲：「以生存競爭實行天然淘汰是『自然』的規律，這是由古至今的人類生活所都不能免却的。這個競爭曾經有過三個樣式，第一個是羣和羣的競爭，第二個是階級戰爭，第三個是各階級中個人間的爭鬥。……這三種衝突的最後原因都是由於生活對食物用品的壓迫。……都是由於自然的吝嗇，人類稟賦的不平等和社會際遇之不同。……祇要這個衝突有一天存在，人類生活的解釋就必得仍舊是經濟的解釋——關於物產和人類欲望的解釋。」

「大概塞利格曼心目中認爲人類底進步可以克服『自然的吝嗇，人類稟賦的不平等和社會際遇的不同』吧！所以他對經濟史觀底評價是這樣：「他是一個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解釋。他在已往，完全是實在的；他在以後，漸漸的就要不十分實在了。」

在表面上看來，修正派底經濟史觀要比極端派經濟史觀更能解釋歷史，更近真理些。但是事實上，修正派底經濟史觀祇是極端經濟史觀理論上的退却！牠底與起祇說明了極端派經濟史觀底站不穩脚跟，祇說明了極端派經濟史觀底崩潰。修正派底經濟史觀放棄經濟因子是獨立的、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而祇認爲是重要的力量。這是牠底進步的地方。但是因爲沒有更高的綜合，使牠陷於不可救的循環圈中。因爲牠認爲：生產與交換底一般條件（也就是經濟因子）之變遷，決定一個社會底階級結構之變遷，這旋又引起階級

敵對底變更，結果成爲一個社會之政治的社會的知識的上層結構之變遷。但是恩格斯不是說過：「經濟以外，還有各種要素，相互之間各受影響。」嗎？什麼是經濟以外的各種要素呢？這就是「階級戰爭的政治形式，結果，和組織；法律之形式，各級人民腦海中對於這戰爭的反映；各種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學說，與宗教的觀念」，總而言之就是「上層建築」(上層結構)。這樣，經濟因子影響「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亦影響經濟因子。這樣，就是說經濟因子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亦變成毫無意義、毫無內容的口號了！而且就事實上講，說經濟因子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勉強的，更不用說是決定的力量了。經濟落後的帝俄變成了社會主義的蘇聯，和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英美仍舊是資本主義的英美，就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證！最後，修正派底經濟史觀雖然放棄了經濟因子是獨立的、唯一的、決定歷史的力量，但他沒有放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衝突底必然性的學說，亦就是承認階級鬥爭是「革命」的。所以我們在前面對於極端派經濟史觀關於這一點的批評，此地可以完全應用。

三 經濟史觀與民生史觀

極端派底經濟史觀是建築在錯誤的哲學基礎上的，根本一錯，所以一無是處了。修正派底經濟史觀祇部分的消極地放棄了錯誤的哲學基礎，而沒有積極地容置在另外一個正確的哲學基礎上，所以牠自身底理論就陷入了循環圈中。那末，什麼才是建築在正確的哲學基礎上的歷史觀呢？無疑義的

，這就是民生史觀。民生史觀底哲學基礎是相對的唯生一元論；依相對的唯生一元論看來，所謂「物」不過是指較低級的生罷了，所以相對的唯生一元論是統攝唯物論的。生就是運動，而這運動是一直線的向上過程，所以根本排斥辯證過程的運動。根據這個正確的哲學基礎，民生史觀認爲民生是歷史底重心，即求人類底生存是歷史底動因；一切文化底展開，經濟組織底改良，道德底進步，不外是人類努力求生存的結果；一切社會關係底創立或轉變，也不過在求更美的生存。而認爲歷史底發展是一直線的追求更美生存底過程。所以除去了經濟史觀中底辯證法則，那末，經濟史觀亦可以統攝在民生史觀之下了；經濟史觀部分的真理就在此，經濟史觀部分的價值亦在此！

至從前的社會，因爲人類底文明不夠——相對的最高級的生底高度不夠，所以社會中及動的力量很大，經濟史觀中辯證法則底錯誤因之沒有完全暴露；在從前的社會，因爲人類在窮困的壓迫之下，所以生存中底一個基本的欲望——經濟的欲望特別顯到重要，經濟史觀拿經濟因子來解釋整個的歷史，牠底不完全性因之亦沒有完全暴露。但是，隨着人類底進步——相對的最高級的生底更高度的發展，社會中底反動將漸趨消滅，經濟欲望底重要性將大大地退，因之，經濟史觀底錯誤和不完全性亦將完全暴露了。所以，我們對於經濟史觀的評價是這樣：「牠本來就是一個錯誤的解釋。在已往，牠底錯誤沒有完全暴露；在以後，牠底錯誤將完全暴露了。」

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郭博宣

在三民主義成爲羣衆信仰的中心與革命指導的原則時，愈會引起人的剽竊與附會。剽竊者是敵僞，我們容易看出他們的陰謀，不致爲其迷惑。附會者是國人，大家却容易受其蒙蔽影響了信仰統一。試看國家主義派的人，說民族主義與

國家主義相同，民主主義派的人，說民主主義與民主主義相同，尙覺言之無物，不致魚目混珠，惟有共產黨的人，強調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却斷章取義以總理「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的話，作爲附會的理由根據，企圖將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打成一片，進而企圖僅留三民主義的外衣，而變成共產主義的實質，再進而在「馬列主義中國化」之下，使「三民主義馬列化」。這是多末陰險的計劃？毛澤東更強調的說：「認爲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不相容的人，實際上是不懂三民主義的人。特別是不知三民主義爲何物的人」，這又是多末武斷的曲解？然而「總理的遺教」，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之正統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的國情，擷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治制度之精華，再加以自己所獨見創造的許多真理所融鑄之整個的完美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是崇高博大的學問，一方面是切實可行的方案。」「（總裁語）因此他對於世界各種主義與制度，固然要容其所當容，取其所可取，但其中却有他的中心思想和獨見創造，不同於任何主義，更不是任何主義。

一、就思想上講：總理的思想，一方面受了中國幾千

年歷史的薰陶，一方面受了當前社會環境的激刺，由「時」與「空」的合流衝激之下，使他與馬克思及羅利亞等唯物論者的思想，根本不同。

中國古聖先賢嘗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人類最高慾望，而養生便是道德的極則，因此思「天下飢猶已飢之，天下溺由已溺之。」對民生問題，便不敢不詳加研究，研究的結果，認爲民爲邦本，而「食爲民天」，故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民生之本，如有戕賊民生者，他們真嫉恨如仇，孔子聞「季氏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雖親如弟子，亦絲毫不肯曲宥，其態度是如何的嚴正！至孟子則以利民生、啓民智、敦民德、爲仁政之三大要則，大學爲闡述儒家思想有組織的著作，而叛重理財對民生問題更看得比較實際，但是他們的重視民生，却不是完全站在物質的觀點上，去發展人類的物慾，尤重於「富而教之」，使其不至「爲富不仁。」而知「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種經濟與道德調和的思想，既不唯心，也不唯物，總理繼承這種偉大的思想，自然要以「民生爲建設之首要。」而以仁愛爲革命的中心思想，他嘗爲不能愛護最大多數的勞苦羣衆，就是不仁，不仁就是反革命，所以說：「既不能反對帝國主義，又不能爲農夫工人謀利益，在革命的中國國民黨裏，就可以紀律來制裁他。」再由這種思想引而申之，他就認爲：「民生就是政

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如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誤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要解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的（民生主義第一講）這與馬克思的思想完全不同。試看馬克思在「經濟學批評」的演文中所說：

「人類社會的生產衣食住時，必然的發生一種與自己意志相分離而獨立的關係，而且這關係——就是一種生產關係，和那社會的物質的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應的。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就形成社會上的經濟的構造的東西，此處發生法律自覺。此種衣食住的生產方法，可以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一切生活上的過程。……社會經濟的基礎如果發生變動，則在這巨大的基礎上面的全部建築物，也要遭到改革的命運了。現在我們要考察這種革命的時候，我們先要明白這兩種革命的區別，就是：『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上，科學的取得真實證據的物質的革命』和『人人了解這種矛盾，而欲脫去這種矛盾時所發生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及哲學的——就是精神革命。』例如我們批評一個人，決不能常常依據那個人所想着的地方，所以我們想批評這樣的革命時代，也不能依據那個時代的意識的。我們甯可由物質的生活矛盾中，就是依社會的生產力及其從生產關係之間所存在的矛盾，去說明這樣革命的時代。」

這就是「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的不同。

但是，馬克斯祇看到物質是歷史進化的重心，却沒有看到推動物質進化的動力，是人類與生俱來，死而後已的求生慾，人類為了求生存，才作種種活動與努力，來推動歷史的前進。試看，蘇俄革命成功後，於一九二一年採行新經濟政策，容許資本主義的暫時存在，便是要從經濟利益上，去激勵全國的工商商，在自己的生產事業上好好努力，這是因為人類對於自己的生命都有要求存在，延續和發展的慾望，若祇給他存在的機會，他便不肯作延續和發展的工作，若祇給他存在和延續的權利，他仍不肯在發展方面努力，必須給他以整個生活的範圍，他才肯作種種活動與努力，以滿足自己的慾望，並推進歷史的進化。其次馬克思將經濟與物質混淆不清，所謂「唯物」實際祇是「唯經濟」，因此猶利曼教授，便把他稱為「經濟史觀」，然而經濟却不是社會變動的唯一原因。經濟以外的政治、宗教、法律、倫理……都可變動社會，都可以拿來解釋歷史。即以唯物而論，物質環境，固可以支配人們的意識，但意識也可以改造物質環境，所謂移山填海之功，有志者未嘗不可有所成就。

二、就社會背景和方法上講：人類的感覺思想，要以外在的事物為範本，思想正確與否，正是看思想是否與外界事物相吻合，這是唯物辯證法的人，所有的基本認識，那末我們看：總理與馬克斯所處的社會背景如何！誰的思想與外界事物相吻合，是否同一的辦法，可用於不同的「時」與「空」環境之內。

總理生在農業與手工業經濟組織，尚未打破，而資本主

義的經濟組織，形將建立的中國社會。「……人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因此，不能祇注意分配問題，還要注意增加生產，以期「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同時要使歐美各資本主義社會所發生的矛盾與慘酷事實，將來不出現於中國，以故在分配方面，「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視察以上情形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在社會進化到現階段來說：一是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上，推翻封建主義，建設資本主義的革命；二是由資本到社會的階段上，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但中國所處的環境，又是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單獨的來解決社會問題，仍是不能完成革命的歷史任務，必須與民族民權兩種革命而進行其革命的成績，才有保障。環境與任務是如此艱鉅，而中國的民族性，却是在講道德，說仁義的王道精神之下，陶冶融鑄出來的特殊形態，空幻的主義，冷酷的作風，在中國的社會都行不通，「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仁道理想，幾千年來，深深的印象於中國人心，這與馬克斯所處的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完全不同，因為他所看到的是：

- 一、資本集中，資本家操縱生產關係，中產階級消滅，促成階級分化，使人類劃為勞資兩個對抗的營壘。
- 二、在自由競爭和商品生產情形之下，成爲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組織，使生產過剩，經濟恐慌，工人失業。
- 三、在需要爲生產標準，以賺錢爲生產目的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工資鐵律」決定了工人的命運

，使勞動者永無翻身的機會。

他自然要以，「一、糾合無產者團成一個階級，二、顛覆有產階級的權勢，三、無產者掌握政權」。換言之即以階級鬥爭，爲廢止私有財產的革命方法，但這是十九世紀時代歐洲革命的一種理論產物，決不是可以因襲的模仿的，而是各有各的歷史任務的。因此總理盱衡時勢，便訂定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等爲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革命辦法。

總理不但以爲時代和環境不同，我們不能拿馬克斯的辦法，來中國實行，根本他認爲馬克斯的理論和辦法，就有他本身上的缺陷，因此他對於：

階級鬥爭的批評說：不知「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民生主義第一講)「不過俄國革命六年以來，我們所看見的是他們革命手段，只解決了政治問題，……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民生主義第二講)

的確馬克斯的階級鬥爭是：一、將社會的病態，看成社會進化的原因，二、將物種的進化原則，用於人類進化。因此中國不但不能拿來實行，即在俄國也並沒有採用，俄國所採行的實際是列寧主義，雖然史達林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斯主義」是馬克斯主義的

向前發展，但實際上不如說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比如馬克思明明說：「舊的社會組織，發展到了某種階段，現存的社會制度，便成了社會發展的桎梏，而同時新的社會制度產生的條件，也便在舊社會中孕育完備了，此時社會革命纔能發生，纔能成功。」而列甯則說：「社會革命，雖能發生於產業發達的國家，然在產業不發達的國家，反而最容易發生，在工業最發達的英美，反難於實現社會革命。」其次馬克思主張實行社會革命，因各國情形不同，可分別採取議會政策或直接行動，而列甯則專崇拜暴力，同時馬克思所忽略的農民問題，列甯特別注重起來，而提出「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的口號，從這些問題看來，愈是列甯的精微偉大，便愈是馬克思的空幻錯誤。

其次令人懷疑的，便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每次鬥爭的結果，不是社會制度根本改造，便是兩交戰的階級同時並倒。」這種尚不知勝利誰屬的鬥爭，怎能促進社會的進化；不幸兩交戰的階級同時並倒，社會將成了何種形態？即幸而無產階級成功，消滅；社會的階級，沒有了鬥爭的對象，社會進化，又靠什麼力量再來推動？這是階級鬥爭理論上與事實上的錯誤。

總理對於馬克思的盈餘價值批評說：「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們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其實「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力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

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民生主義第一講)他既忽略了生產方面一切有用有能的份子，和消費社會上的一切消費人士，更忘記了足以產生盈餘價值的許多其他因素，誠可謂祇看重了有形的事功，而忽略了無形的事功。正如孟子所說：「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這樣偏激的意見，如聞之於子與氏，定要罵他：「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此外對於他的資本集中說，總理也有很多的批評。這些都是在理論上和方法上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不同

那末，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毫無相同之點嗎？不，經濟平等的理想上，是一點相同之著。

三、就目的上講：民生主義的全部理想，則較共產主義遠大深切，因爲共產主義，祇注意了經濟問題，而忽略了民族和政治問題，結果，雖然經濟上的階級消滅，而政治上的階級又隨之而起，過去資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但將來無產階級又會壓迫資產階級，蘇俄今日的情形，正是如此，這樣仇恨相結，循環報復，革命成功，直須俟河之清，所以三民主義的革命，要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同時解決，使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而造成員有、民治、民享的大同社會，使將來永無侵陵壓迫的事實，而免除仇恨報復的現象，這種遠大的目的，實非共產主義可比，因此總理說：「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

均包括其中。」而用圖示之如後：（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演說詞）

民生主義的社會基礎

甲、緒言

三民主義是救中國唯一的主義，這是現在每個中國人都有的信念，可是究竟牠為什麼能救中國？為什麼牠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主義？一般人對於民族民權兩主義的認識比較清楚，因為民族主義，在現在對內統一，對外求勝利的時候，已經很明顯的表現出來了；至於民權主義，因為自民元以來，有過幾次立憲運動，雖然都告失敗，可是也使國人認識了真相。只有民生主義，一般人就認識不清，甚至於有錯誤。因為總理曾經說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所以有些人就斷章取義，錯誤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但是民生主義畢竟不是共產主義，因此有些人又誤認為民生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可惜總理三民主義的稿子，在民國十



胡鴻烈

一年陳炯明叛變的時候，已經爛了，而以後三民主義的演講集中，對於民生主義的記載又不詳細，所以會使一般人，有意的或無意的發生誤解。可是我們從這簡單的記載中及總理自己所說的話中間，所以窺出民生主義真義之所在。總理會說：觀察世界的大勢，默想本國的情形，以為實行民族革命，民權革命，必須兼顧民生主義，才可以免將來的經濟革命」。而且他又說過：「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所以民生主義是適應世界潮流及合乎我國國情的主義，牠在中國社會裏，有着深厚不拔的基礎，能够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乙、中國社會的土地問題與平均地權

中國的社會，從周朝開始，已經進入農業社會的階梯，

自周朝到現在雖然經過三千年，換了幾十個朝代，而中國社會的本質，並沒有變動，中國社會到現在還沒有脫離農業社會。中國社會的一治一亂，其主要的理由，簡單的說就是土地生產率不能與人口增殖率相應，結果糧食就不夠供給，發生飢荒，因之盜賊蜂起，社會不寧，如果到水旱天災或政治腐敗的時候，那麼這現象就更顯著，而社會問題，也勃發得更快。因此列代都急急乎先謀土地問題的解決，可是他們都沒有成功，現在把他們的方法，擇其要者，簡述如下，可以作為我們解決土地問題的參考：

(一) 周的井田制：當周滅殷而主中國的時候，我國地廣人稀，可以實行井田制，可是到周末，因為人口的增加，土地不够分配，使井田制度破壞，經過了春秋戰國的大屠殺，由於人口的減少及利用土地方法進步的結果，使社會秩序又得安定。

(二) 西漢的土地政策：西漢對於土地的分配，可謂已盡其全力，西漢食貨志中有云：「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民受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而西漢因為重農緣故，對農業非常注意，使土地的生產率提高，所以武帝雖窮兵黷武，社會問題尚不至馬上發生，可是武帝以後，人口增加得很多，而帝王對田事，也不如武帝一樣的重視，結果土地的產物，又不够供給當時人口的需要，社會就因此不甯。

(三) 王莽時的井田制及賈似道的公田制：西漢末年，既然有嚴重的社會問題發生，所以王莽就沒法解決之，可是他所用的方法，一味做古，採用井田制，他下令曰：「今更

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法令至死」。但是這種違反了社會進化的原則及當時社會情形的辦法，結果當然失敗，所以三年以後，他又廢除了這詔令。

至於南宋賈似道的公田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這樣可得田一千萬畝，而每年可收米六、七百萬石，可是這辦法行到後來，雖有田百畝，二百畝者，亦所不免，民之入田於官者，多失其實產，而所得者又多不足以相償，因此人民破家失業，民生大瘁，外侮之來，不能抵禦。從這個歷史事實可以知道，充公人民的土地，則徒足以擾民，無益於民。

(四) 西晉及南朝所行的占田制：占田制是土地分配的制度，其目的在乎每人有最少限度的田可以耕種，晉武帝在平吳之後，就實行占田制，使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二十畝，又限王公田宅及品官占田，東晉與南北朝，也沿習這個制度。但是因為當時沒有舉行土地陳報與丈量的手續，結果土地還是被少數人所占，民生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五) 北朝的均田制：魏孝文帝用李世安之言，辦行均田制，其目的亦在求土地分配之平均，李世安曾說：「……蓋欲使士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隨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當時的辦法，凡男夫十五歲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授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至於北齊、北周與隋的授田方法，與魏大同小異，不再贅述。

人民老死以後，奴婢與牛出賣後，將山還給國家，國家復歸無主的土地沒收，充作公田，再分配給一般良丁。但是結果總因為人口的增加與豪族不斷兼併的結果，使均田制歸於破壞。

(六)明代的魚鱗冊及開方法：明代的魚鱗冊，就是由土地丈量的結果而所得之，田畝表，其實施的辦法，就是隨稅糧之多寡，分田為幾區，區定糧長四人，集合糧表及耆民親自去度量，遂量得田形之方法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為冊，號曰魚鱗冊，冊成，田之經界始正，而政府的抽稅與管理，亦因之方便。其次，到了神宗的時候，張居正因感田賦失額，小戶多存虛糧，因此實行開方法，通令丈量，限三年以內竣事，結果豪猾不能隱瞞，百姓無虛量，總計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多三百頃，而查明荒蕪土地，令民耕種，可以不納租稅。自張居正之開方法實行後，不但國家收入增加，民生亦因之大蘇。這足以表示，要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土地丈量與陳報，是非常重要的。

至於清朝對於土地問題之解決，多慕效明朝，並沒有新創的方法。至其末期，則有農務局、農學堂、農事試驗場的設立，而又有國外新農學的輸入，可謂已着手對中國的農業加以改革，可惜清末政治已趨腐化，此種改革，徒有表面，不着實際，毫無成績可言。

要解決中國土地的問題，從以上幾個歷史事實中，以得到幾點教訓。

(一)中國今日尚為農業社會，所以中國社會問題的重

心就是土地問題，欲解決社會問題，必先解決土地問題，因此列代，都用盡方法，以謀其解決。

(二)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最主要的，並不在只求土地如何的分配，而在如何提高土地的生產力，過去由於不守這個原則，所以只求土地分配的制度如井田制，占田制，均田制都歸失敗，因為人口增加，而土地生產率並不增加，即使增加，也不能與人口增殖率相適應，因此只求土地分配的均勻，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

(三)土地的丈量與陳報，對土地問題約解決，有很大的幫助，如張居正的開方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四)凡違反中國社會現狀及強制的將人民土地收歸國有的土地政策是行不通的。前者如王莽的井田制，後者如買似道的公田制，王莽時因為人口已經比周增加，而且因為社會進化的緣故，土地已為私有，一旦禁止賣買，收歸公田，當為人民所反對，不能實行。至於買似道的公田制為什麼不能實行呢？因為人類總免不了有自私自利的心理，這種心理應用得當，可以促進生產，在國民道德還沒有普遍提高的時候，如果把人民的田，都收歸公有，則人民失去資產，他們對於公田的耕作，當然不及自己的努力，所以結果使土地生產率降低，只有擾民而已！這現象不但見於南宋，且見於蘇俄革命之後，因此蘇俄用新經濟政策來代替這辦法。而且當一個國家，在外敵壓境的時候，如果實行公田，則至少社會上多一次擾動，給外敵一個可乘的機會。南宋的亡國，買似道的公田制，實在不能不負一部分的責任。

其次再從中國土地問題的現狀來觀察，對於解決中國的

土地問題，亦可得到幾個原則：

(一) 中國各省荒地甚多，據民國二十四年官方的統計，五百三十縣中，就有荒地二萬三千萬畝，以外如蒙古、新疆、西藏、西康等地均未列入。

此種荒地，或為山荒，或為平荒，或為灘荒，未必均不能耕種，只需講求水利，已可得一部分之解決，或種以適宜於此種土性之植物，其所得之利，亦可不小。

(二) 中國的荒地既如此之多，而農民反多窮困不堪，以致不能獲得生產資料如土地、肥料、農具等，使土地生產率降低，據民國二十四年中國經濟年鑑的估計：

中國各省區農家種地面積不滿十畝，佔全體百分之四二·八，十至十九畝者佔百分之二四·六，共為六七·三。又南北各縣，農家耕地面積，在二十五畝以下者，平均為百分之八〇·八。換言之，農民耕地面積約有百分之八〇、八未過二十五畝，況其中耕地面積稍大者尚有不少的佃農，但每一農家如耕地不足三十畝者，是很難維持一家生活的，因為除掉所下的資本（肥料種籽等）及繁重的租稅，所得的收入實在是很少的，所以結果中國農民在貧窮線以下的，約有四分之三。

這樣貧窮的農民，他們那裏還有餘力去改良土地和開墾荒地呢？

(三) 我國雖以農立國，可是農業却已落後，以致土地生產力降低，今日急務，在乎引用國外的科學方法，來改進中國的農業，增高土地的生產力。

(四) 我國今日只有小地主階級而並無大地主階級，對

付比較容易，而且地主與農民的中間，尤保持相當感情，他們現在同愛國外資本主義經濟上之關係。

以下從勞力而加以分析，使我們對土地問題的解決，得到了兩個原則：第一是離開了這八個原則。而談中國土地問題之解決，一定歸於失敗。若依照了這八個原則，則一定能夠利進行，逐漸進入成功之域。而民生主義對於中國土地的解決，都階階地吻合了這些原則。

(一) 中國社會問題的重心是土地問題，總理在民生主義中就首先承認土地問題的重要，因此實行民生主義，第一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而且他又說過：「民生主義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如果吃飯問題不能解決，民生問題便沒有方法解決」。所以，總理能體認中國社會治亂的關係，而重視土地問題。

(二) 民生主義對於土地問題之解決，並不只注重分配，而注重於生產，也可以說在耕者有其田的一個意義上分配只是手段，要達到提高生產的目的，所以平均地權，並不如過去的均田制，均田制一樣只注重分配而忽視了提高土地的生產力。同時又因為中國的農民大多數都是在貧窮線以下生活着的，他們沒有力量來改良農業，所以民生主義更進一步的，政府協助農民，引用國外的科學方法，從機器，肥料，換種，除害，製造，運輸，防災等方式，提高農業生產，復設立農民銀行，農科合作社等以救濟農民，使全中國的人，不但飯吃，而且有很便宜得飯吃，所以平均權的辦法實行以後，土地的分與生產之問題同告解決。

(三) 土地問題的解決，是最先必經的步

礦，因為師報與丈量是整理土地的基本工作。因此平均地權第一個辦法，是地主照價陳報，所以平均地權對於丈量與陳報的工作非常注意，有了這一步作基礎以後，其他辦法就很容易被推行，因此也如開方法一樣，可以收得很大的效果。

(四)我們因為沒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而且地主與農民間尚有相當感情，又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及武力壓迫，所以宜用溫和的方法，去解決中國的土地分配問題，不宜用暴烈或過激的方法，因為不但地主或農民或其他階層都不歡迎這種辦法，而中國現在的國情，也不允許這種辦法的推行。來擾動中國的社會，使帝國主義又得有一個可乘的機會。否則，則只有踏中國過去的公田制或蘇聯革命初期土地政策覆轍，徒足擾民毫無利益可言。

綜上所述，可知民生主義對於土地問題的解決，不但認識我國社會治亂的因果關係，而且合乎社會的現狀，在我國社會裏，有着牢不可拔的基礎。可以說，是解決中國土地問題唯一的良方。

丙、中國社會的產業問題與節制資本

爲了要使中國成爲一個富強康樂之邦，要解決中國整個的社會問題，而且見了國外資本主義的末路，所以除了對土地問題要謀妥善的解決外，對中國的產業，也須同時加以發展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須從中國社會的本身及國外資本主義給予中國社會的影響二點來觀察，覺得中國除求貧富的平均外，實在還須發達國家資本，在經濟上，可以不做國外資本主義的附庸。

先從中國社會的本質來觀察：

一、在中國社會裏，貧富兩階級並不顯著，也沒有階級意識。中國社會自秦漢以後，執掌政權的，不是地主階級也不是無知無識的農民，而是第三階級的士大夫，這些士大夫，有些或許就是小地主，可是大多數都是很貧寒出身的，他們調整了小資產階級及勞動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兩者之間不但不起衝突而且相互幫助，並沒有階級意識。到了現在因爲我國產業的不發達，沒有產生大資本家，總理曾經說過：「中國人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因此今天的問題並不着重在怎樣求分配，而是在努力發達國家資本和防止私人資本的發展。」

(二)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還停留在農業社會裏，我國無論農業、商業、工業、交通、礦業等都需盡量改良與發展，使我國成爲自給自足的國家。今以二十四年上半年爲例從進出口貨物之百分率中，就可以看出。

我國輸出商品以原料及半製品佔大多數，手工業及工業製造品只佔極少數，而輸入品中則以製造品佔多數，最可奇怪的，就是在二十四年上半年中，米的輸入竟佔第一位，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我國不但工商業不發展，就是農業生產離自給自足的境域還很遠，我國產業的不發達，實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三)中國是地大物博，蘊藏豐富的國家。中國的產業不發達，是不是因爲中國是個先天不足的國家，這是誰都否認的，中國有着廣大的土地，以面積而論，有一一、二七三

五五八平方公里，而且些土地，大多都適宜於耕種的。同時礦產與動力的蘊藏又很豐富，以礦產而論，鐵的貯藏量就有二、八二〇、〇九〇、〇〇〇噸，此外如錳、水銀、銅、鎳的礦產也很豐富。以動力而論，煤、石油及水力合計其可儲發出的動力據專家估計有九三、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基羅瓦特小時之多。

由此可知，我國的天然資源是非常豐富，可惜棄棄於地，不被人所開發或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源，就是發展產業很好的基礎。

(四) 中國社會有充分的勞動力。我國有着衆多的人口，即使以常識來判斷，以後若發展產業，勞動力定不感缺乏。據民國二十五年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的估計，中國各省市失業工人的數目，共有五、八九三、一九六八，而實際上恐怕失業或半失業的工人，尚不止此數。就我國人口而論，大部分為農民，據官方的統計，在抗戰以前，我國二十五省總戶數為七八、五六八、二四五，農戶數為五八、五六九、一八一，農戶數對總戶數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七四、五，因此據估計所得，我國鄉村人口約在三萬萬四千萬左右，這些農民大都善於勞動的，現在因為農業未加改良，所以大部分的勞動力，都膠着於農村裏，將來農業技術進步，這些勞動力就可從事於其他產業的發展，因此我們除天然的資源很充足外就是勞動力，也足應付以後發展產業的需要。

(五) 資本與技術的缺乏。我國發展產業最大的障礙，就是缺乏大量的資本與技術人才，因為我國產業不發展達而且受了列強經濟的剝削，已經數十年，所以造成了國窮民貧

的現象。沒有資本去發展本國的產業，又因為我國科學與數育的落後，特種技術人才亦感缺乏。這二大障礙，是必須設法解決的。

其次，再從國外資本主義給予中國社會的影響而論：

(一) 資本的外流：國外資本主義，利用我國產業的落後，因此將其商品，大量向我國傾銷，作為其推銷商品的市場，同時又從我國攫取大量的原料，這樣一進一出，我國每年就要損失數萬萬元，今將民國二十一年、二十二、二十三、及二十四年上半年入超數字示之如下：

二十一年	八六七、一九〇、九六四元
二十二年	七三三、七三九、一九九元
二十三年	四九四、四五〇、九四五元
二十四年上半年	二八六、〇八五、六二三元

註：自二十一年度下半年起，東北各機關的數字均已除外，據滿鐵月報載稱，二十二年一月至十二月，東北各機關共入超六千餘萬元，因此實際上我國入超額尚不止此數。一資金不斷的流，是造成中國貧窮最大原因，可是這種無形的經濟侵略，一般國人還不易察覺。

(二) 私人所經營小規模的工業，在中國不易發達

國外的資本主義，利用其雄厚的資本，大規模的生產，復根據不平等條約的規定，降低關稅，將其商品廉價的傾銷於中國市場，我國小規模的工業生產，因為成本較高，當然遠不能與其相競爭。而尤其可以摧殘我國工業的，就馬關條約中規定日本得在我國各通商口岸設立製造廠，各國也據例享受，因此各國得利用我國便宜的勞動力與原料，復利用其

雄厚的資本及各項特權，在我國設廠製造，我國工業的萌芽，就悉被摧殘。國外資本主義向中國侵略下，我國小規模的工業，決無發展的希望。尤其這次抗戰，敵人竟集其全力，來破壞我國沿海的工業基礎。因此戰後中國的工業，非由國家的力量來統籌經營不可。

(三) 提高國人的物質慾望：自從國外的商品輸入中國以後，國人的物質慾望，就大大的提高，這些物質的慾望，固能使中國的資金，大量的外流，可是牠也能促進中國產業的發展。如果中國產業的發展，不能與國人的物質慾望相應，則資金不斷的外流，爲要防止資金的外流，最根本的方法，就要發展中國的產業。

(四) 資本主義不足以解決中國的產業問題：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結果，就發生了貧富的對立，而大資本家又併吞了小資本家，使貧富的對立更尖銳化，有一部分人民就在貧窮線下過活，有的還得不到工作做，因此失業問題異常嚴重。不能解決生活問題，這些現象，當然不是我國人所樂聞樂見的。總理曾說，「二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邦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予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因此我們不可蹈資本主義的覆轍，一勞永逸的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民生主義中節制資本的辦法，完全能適應上述的事實，所以不是憑空虛構，而是在中國的社會中，有很深厚的基礎。

(一) 中國因爲窮，外國生產過剩，中國是生產不足，且資金不斷外流，所以節制資本，首先要發達國家資本，來發展中國的產業，就是適合於中國社會的現狀。

(二) 因爲在中國社會裏，貧富兩階級，既不明顯而其對立又不尖銳化，所以不必用階級鬥爭或無產階級專政等暴烈的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能用溫和的方法，積極的，大規模的生產事業，由國家經營管理，而且如果由私人來經營易被國外的資本主義所摧殘。消極的所得稅，遺產稅，和其他直接稅的方法，來節制人的資本。這樣以後，中國的生產與分配問題，亦可同告解決。

(三) 因爲中國缺乏資本與技術來發展產業，所以將來要借用國外的人才與資本，但是發展產業的主權，還是要操之在我，不能因此而喪失權利，這樣加上中國豐富的資源及勞動力，我國的產業一定可於短時期內發達，而所借債務，亦可於短時期內償還，因此可得外資之利，而不蒙其弊。

(四) 總理因爲看到外國產發達後，勞動階級的工人，仍是得不到幸福，所以總理不但在民生主義中要發達國家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並且還要提高工人的待遇，用法律來保障工人。這樣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可以調和，而社會也可因此進步，因爲社會的所以有進步，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而並非由於互相衝突。

因此節制資本的辦法實行之後，在消極方面，既不會產生資本家，在積極方面，則我國產業可獲發展，國家資本可以增加，這種產業及資本，並不是謀少數人或某個階級的利益，是謀全國人民的利益，使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到幸福，而

且民生主義認為全國有一個人穿不暖，吃不飽，都認為其責任還沒有盡到，等到每個人都能足衣足食的時候，中國的社會問題也就完全解決了？

丁、結論

由上面分析的結果，可見平均地權偏重於農業方面，節制資本，偏重於工商業方面，民生主義既不是共產主義，因為共產主義是用暴烈的方法，去達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而民生主義則主張用溫和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方法，同時來解決中國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問題，由上面的分析，

黑格爾精神的新認識

李宗洛

黑格爾是唯心論的集大成者，唯心論盛行於十九世紀，由康德，費希特，謝林格，而到黑格爾，唯心論在德國的學術史上築就了他那閃閃燦爛的殿堂，博大精深，蔚為奇蹟，黑格爾的哲學可分為兩部，一部份是他的哲學體系，另一部份是唯心辨證法，他的哲學體系，不免於保守偏執，造成了德國狹隘的國家主義的精神，而相反的他的唯心辨證法的部份，說明了精神運動的法則精到深刻，最有永久存在之價值。我們從黑氏的精神現象分析上，可以看到黑氏搏戰奮鬥，忍苦受難的精神，此後馬克司應用了黑格爾的哲學方法，而加以改作和顛倒，來研究經濟的歷史，并英國的社會資料，和法國大革命的方法而構成了他的學說之全部，現在我從唯

可知中國社會問題，是生產重於分配，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不能只注意分配，不能用過激的方法，因此共產主義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而民生主義又不是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的目的在賺錢，實行的結果，只謀少數人的利益，而民生主義的目的在養民，使全國人民都能得到幸福，所以資本主義也不足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只有民生主義兼兩者之長而無其弊，不但在學理上有根據，而且在我國社會裏，有深厚不拔的基礎，只有民生主義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物論者的詆毀聲中，說明黑格爾與唯物論的機動關係，而認識其根本精神的所在。

唯心論者只承認唯物論是方法與技術，而不是哲學中的本體論，可以當作由用知體，由現象回憶本體的，現象學的方法，希賓諾沙（Spinoza）曾說：以經驗中之事實，證明超經驗的上帝之存在，有用即有體在，有有限即知無限之存在，有變滅者即知宇宙間有不變滅者永恆的存在，有依靠之弱者，即知有絕對有力之強者的存在，在唯心論者，認為把這一番話應用到經濟方面，可以說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也就表示該社會的意識形態，精神生活，而反映其一切的上層建築物，但是他們把唯物論當做現象學的方法并不是說以物

質決定精神，乃是以物質了解精神。

馬克司是接受了黑格爾的遺產而加以改作和顛倒來建立他的學說體系的，黑格爾用辨證法以指出精神現象之一正一反一合的矛盾進展，而馬克司則是用辨證法以指出經濟狀況之一正一反一合的矛盾進展，黑格爾認歷史為精神循環矛盾之法則，以自求觀放的歷程，馬克司則認歷史為經濟循環矛盾之法則，以自求解放的歷程，這樣用辨證法以分析意識現象，和用辨證法以分析經濟現象，只要不涉及形式上問題，不返向到心物之根本關係，彼此間是并不對立的。

——唯物論是緊接着黑格爾之後而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的哲學，雖然黑格爾的哲學裏包含着唯物論的種子，却并不是就包含着唯物論，而且從黑格爾到唯物論，是經過一翻重要的改造，黑格爾把理性當做世界發展的根本物質，實體等不過是理性發展的一段，或理性自身的外化，他說 *Matier is mind in its otherness*，這無論外表和內容都貫徹着唯物論的精神，或者如唯物論的創始者說：黑格爾是倒立着的唯物論，這是說黑格爾的方法論是唯心論的方法論，而內部具有唯物論的一粒種子，唯是論創造者之顛倒黑格爾的哲學，就澈底的加以改造過，不僅取消了理性觀念等等的形容詞外，而且歸納黑格爾的辨證法為矛盾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黑格爾把一切運動根本看做理性的運動，或純邏輯的運動，物質是精神的外化，存在為意識所決定，把存在的意義降底，不把理性和純邏輯範疇的意義提高，是他全部哲學的一貫特性。

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的唯物論者，就特別看重了質量

的變化，而將質量互變的定律和矛盾統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并列起來，這在方法論的改作上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換言之批判接受黑格爾的唯物論者，一定將唯心論的方法論改造為唯物論的方法論，這改造的結果，質量互變律就由低級的法則顛倒到根本法則的地位上來了，這樣一來一切的運動并不僅是純邏輯的或理性的運動，而且是存在自身的有質量的運動，質量運動，在唯物論中是有普遍的高級的意義的，矛盾統一律和否定之否定律，都不能離開質量變化，而孤立存在，事物的矛盾不僅只是範疇內部的純論理的矛盾，而且是有質量的存在自身的矛盾，事物之否定的否定之過程，或正反合三階段的發展過程，也必須是通過質量變化而發展的過程，這是唯物辨證法的主要標幟之一例，如應用在經濟學上面的例子：

封建的壟斷——自由競爭——近代的壟斷

在這個例子裏面，通過了否定之否定的定律，同時也通過質量互變律的應用，譬如因封建的壟斷轉變為自由競爭，由自由競爭再進為近代的壟斷，這一到質量互變的過程，都得到一定的量的發展為前提，在這三段的發展中，並不僅是空洞的純邏輯的變化，而且是表現質的方面，和量的方面的增加，否定之否定律是要通過質量互變律來實現的，這兩個定律的互相誘透，并不能說一個在另一個之上，這樣規律的誘透，乃是唯是論改作那特徵，他們在把握一切事物運動的時候是分不開的，而以否定之否定律為解決矛盾的總樞紐，事物是不斷的向前發展，運動變化的事物決不會永遠停止在一個階段，事物要從一個階段進到另一個階段，必須將舊的矛盾

盾解決了才行。

總之，唯物論者把黑格爾的哲學方法加以批判和改作，發展成爲一個新的哲學，但這批判和改作，却絲毫沒有損傷黑格爾的價值，唯物論只是用來了解分析經濟現象，了解歷史的進展和生產方法的關係，用在分析意識生活，觀察精神現象的矛盾之點上，黑格爾自有其不朽的價值，至於馬克思應用作精神分析之矛盾思辨法於經濟歷史的研究之上，其是否當則不爲本文所論及，以上的一段只是在說明黑格爾與唯物論的機動關係，闡明辨證法中唯心唯物之重大不同之點，而認明黑格爾的價值并不因唯物論問世而貶低。

究竟黑格爾的真諦是在何處呢？黑格爾是用辨證法來解釋經驗，解釋宇宙人生，他對於自我意識之分析，爲最有顯明永久之價值，他以冷眼看透人情祕奧，描寫精神生活之矛盾與光榮，深刻精到，爲他人所不及，黑格爾的唯心辨證法乃是一種矛盾的實在觀，又是一種真理觀，分析意識，經驗，人生，宇宙之矛盾所在，而指出其共同之歸宿點，他認爲須經過很苦磨練，矛盾衝突，能調合那極生便，極不相容的矛盾現象，便成爲有機的統一，纔是真實，真實的東西必是整個的合一的有機體，換言之，就是凡非真實的東西，必是不合理的，自相矛盾的，凡是真實的東西，必是合理的，圓滿合一的，所以實在皆經過正反合的矛盾歷程，以達到合理的有機統一，而且非用正反合的矛盾方式不能表達，實在之本性，所以 Josiah Royce 說：真理的本性就是矛盾的，並不是說真理是互相矛盾，而且不通之理，不過是說真理是包含着有相反的兩面的全體，須用正反相映的方式，才能表達出來。

譬如勃拉得列說：道德之責任在於不 (It is a moral duty not to be moral) 或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都是

一

一種矛盾的真理，換言之只執着片面的道德，或不道德，決不足以見真理之全，應該以道德不道德正，反相映的方式才能表達出來。

黑格爾的哲學既然是我們意識之根本矛盾的分析，從分析意識的根本矛盾出發點，先將了解有口之我與無限之我的關係，然後了解心與實在的關係，康德曾經說過：我們日常生活的世界是有秩序的，有條理的，這並不是我們可以知道外物自身的決對法則，乃是因爲我們的知性 (Understanding) 自有條理，於是我們便應用這條理來整理一切經驗。

如果外間事物的條理是我們的知性造成的，那麼如何可以了解宇宙萬物的問題，便恰好成爲如何可以了解自我的問題，這種見解遂引起許多變本加厲的浪漫派的努力，以求盡量窮究自我的內心生活，自己的小我與無窮的大我之間，總覺得我一些深切不難於言喻的關係，他們說真正的我，這比經驗的自我深邃，真我是無有畛域的，是沖漠無朕的，是浪漫的，是神聖的，只有才子與詩人在飄渺的夢境裏，對真象才可以有真知灼見，但是誰也不能用語言文字簡單明瞭地，把他們所謂的真我說出來，黑格爾對於這些浪漫主義者之含糊空洞，總是加以抨擊譏嘲，不遺餘力，但是他仍認爲哲學上的大問題也即是浪漫主義者所發現出來的問題，也就是康德所遺留下來的問題，經濟的我和現在的我不是我的全體，我無時無地不訴諸過去之我，將來之我，以及當下即在的無限之我，無論何時，只要我有所承許，有所懷疑，有所否認，我

總是不斷地在搜尋我自己的心靈，以求印證，以資指針，這般不斷地搜尋，也可以說是我建動的心靈生活之全部所由構成的，因此康德所指示的，怎樣了解誰是我，什麼是我或什麼是我 (deeper self) 可以說是一般哲學的關鍵，黑格爾對於這些問題一概承認，但他不願在夢境裏求解答，他要慎思明辨的把小我和深我的關係，加以系統的分析。

古代希臘哲學中的一件舊事，主張萬物皆流轉的黑拉克里特說，我們不能同一條河流裏跨進去兩次，然而他的弟子克洛底洛士更說：就是跨進一次也不可能，因河流不斷的變動當我們未跨進的時候此時此地的河流已經逝去了，我知道現在入耳的音樂，我知道聲岸的海浪，不，不是這樣，當我正想說出現現在所知道的東西時，方纔聽得的音樂已經停止了，方纔看見的海浪已經翻破了，我不能說我知，我必須永久說我曾知，從自己飛開自己無窮的歷程 (The eternal flight of myself from myself) 我們的心靈瞬息萬變無有終極，凡我所知決非當前刹那，乃是方逝刹那及方逝刹那到當前刹那之過渡，由此可知此一刹那之我之所以有知識，全在其能知道，能承認，能接受，此方逝刹那之我，而此一刹那又為又一刹那之我所認知，所接受，如此遞進以至無窮，因此我們每人某刻的自我，是他在別時生活中經過一翻回想所得的結果，我現在之為我是什麼，全靠此後所發現的我是什麼，這是內心生活極深刻的矛盾，我們每到成年或老年時纔漸漸發現青春的意義，又如及知道當前的悲歡的意義，必是這場戲劇已經演完之時，一切情感，一切性格，一切思想，一切生活其所以為我們而存在全是因為我們能夠回想他們，能

够從外面去觀察他們，能够從遠處去透視他們，能够從他日之我去認取他們，能够用新經驗去重新解釋他們，死估着不動或獨自佔着與世界隔絕那麼人就是無物，投入關係之林爲你自己或人之回憶而存在，批評你自己，同時被別人批評，觀察你自己，同時被別人觀察，審視你自己，同時被別人從外邊審視，這纔算得一個人物，一個有一貫系統，有魄力，有真生命的人。

既然明瞭內心生活，前後內外之不可孤立，推到社會生活，人我之不可孤立也是同一道理，此時此人的意識與他時此人或他人的意識，息息相通，可以互喻，決不能爲此時此人所獨有或孤立，一切的意識，莫不訴諸其他的意識，內心之意識生活與對外之社會活動，莫不是訴諸他人以及社會或別的精神，除開社會人羣之外，我們便沒有純粹內在的自我，這個世界是無數自我并存的世界，總結起來，意識生活的原則即是自我分化，(self differentiation) 在此矛盾的變化歷程裏，我不過是衆我之一，而內在之我亦是外在的表現於外的我，是，故唯一的心乃是衆心聯結的世界，意識之本性即在於德其自身於在外的關係裏，藉以發現其內在之我此時之我是什麼，其實不過是與別人及別時之我之種種關係的結合罷了，所以說精神之主體即在分化於身於無數精神中而憑藉此無數精神間之互相關係與貫通和諧以爲生。

總之，黑格爾的精神分析就是說精神生活的精蘊在於先自分化成相反的力量，而復戰勝這些矛盾衝突，用自我分化的原則，以解釋一切意識生活，我的人格愈偉大，則我內心之矛盾衝突愈多，而我之征服此種矛盾衝突也愈益堅完，我

所以提高自己靈魂之絕對自我，或我前此所認為真正的自我，即是以制取一切矛盾衝突之力量為存在的唯一自我，也是以千變萬化之矛盾為其生命心髓之唯一自我，此唯一之我，為我們所有一切的矛盾意識生活中最深厚的本源，根據以上

論人生真諦

段叔良

一 人生的真義在那裏

人生有意義嗎？有人在嘆惜：「人生若浮雲朝露。」人生無意義嗎？又有人在自豪：「人為萬物之靈。」人生是快樂嗎？有人說：「乾坤一戲場；生命一悲劇！」人生是痛苦嗎？又有人在歡欣：「何幸而為人。」然則人生的真義究竟在那裏呢？對此問題，人各有不同的見解，因而有各種不同的人生觀；老莊之流以「人為世界」是罪惡的淵藪，主張返乎自然，是為浪漫派的人生觀。失於頹廢，違反進化。柏拉圖主張拋去相對的現實世界，去追求理想的絕對世界，是為理想派的人生觀。抹殺現實，陷於玄想。叔本華及佛家悲人生疾苦，力主捨身出世，是為虛無派的人生觀。充其極，可致人類於滅亡。楊朱之徒以為人生之目的在求目前之快樂，是為快樂派的人生觀。人各尋其樂，反而陷人類於殘殺鬥爭之苦海。墨子邊沁主張人之行為應本於利，尤在求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為功利派的人生觀。其心孔佳，其道大毅。

所說我們得一大生最高的法則，那就是征服一切矛盾衝突的天理，是我們精神生活的全部，是人類精力之所貫注，堅忍之所表現，情感之所結晶，心神之所體會的對象，我們內心在崇高與偉大就在於不斷的征服着意識生活中的矛盾。

倍根笛卡爾以為人應力戰天然以拓「人國」，是為進步派的人生觀。其積極的創造精神可資取法，惜乎忽視了人與人間的關係，遂致人類反因科學的發達而增加罪惡。凡此各派，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人之非而非人之事，誠可謂錯綜紛歧之至了！然而或則謬誤，或則缺漏，均非吾人所敢贊同。

難道人生真是個不可捉摸的謎麼？難道人生就沒有正鵠麼？不，絕不。總理曾經指示我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不以奪取為目的。」總裁又說：「生新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是對人生的正確看法：認定人生有其義務，即為人類服務以增進全體的生活創造繼起的生命是也。由是人生的態度是博愛的，互助的，利羣的，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且站在義務的本位上。這種完美無缺的人生觀，我們稱之為服務的人生觀。人生的正鵠也就在此。

現在讓我們從各方面的探討來加以證明。

二 宇宙的大法

「人生是宇宙間之物，人生是宇宙間之事。」故首先應由宇宙觀出發來探討人生正鵠的所在。惜乎從前的哲學家對宇宙本體的問題未有統一的答案。唯心派以為「大地山河端由心造」，精神，意志或理念是創造宇宙的本源。唯物派以為物質獨存於心外，精神作用僅是物質的反射，宇宙的本體是現實的物質。聚訟紛紜，無所適從！

實則精神與物質是不能分立的。十八世紀以來，機械論者以為沒有能力物質可以單獨存在，於是把能力和物質截然分開，因有分立的質量常任律與能任律。至相對論出，證明質量隨能而增減。同時，新派物理學家湯遜等創設「能量散逸法則」。於是前此分立的質量常任律與能任律已無獨立存在之可能，物質可以作同量的能看，能力也可以作同量的物質看，兩條定律只能結合為一而成「質能常任律」了。能力（精神）與物質的不可分立已為科學所證明。

本來，哲學家也早見及此的。亞里斯多德比肉體之於靈魂，如眼之於見，不可分亦不能分。范繡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總理更說得明白：「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精神與物質二者；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為絕對分立，而不知二者本合於一。」

精神與物質既合為一體而為一物之兩面，故必有一有機的關聯性和整體性。換言之，其背後必另有一本體存在。這

個本體是什麼呢？我們知道時空運動是宇宙本體的獨性，故宇宙的本體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延續性——須有「生生不已」的生命力以表現時間的無窮；第二，活動性——須有「至隨至動」的活動力以表現空間的無限；第三，現實性——須有萬般差異的騷動狀態與均衡局勢以表現時空運動三者關聯之諸種形態。所以牠是一種最基本最微細的東西，而能統攝精神與物質，有生命，有動力，還有神妙的智慧。陳立夫先生名之為「元子」。宇宙乃「元子」基於時空之一切配合而構成，始於一元，終分為萬殊。這就是唯生一元相對論的宇宙觀。

依我們的宇宙觀，宇宙為有生命有動力的元子所構成。故宇宙萬象皆生命的表徵，整個宇宙是一個龐大複雜悠久的生命結構；萬物因生，長，衰，化而循環往復，生生不息，構成一道生命的洪流；「曲成萬物」，充塞宇宙，無非「生生」之表現；所謂「生生之謂易」。人類是精神成於最高的「元子結合體」，宇宙賦予我們的生命力特大，求生之慾也就最強烈最高尚。生是天地之大德，宇宙既有我們，我們就要生，而且要更有意義地生，要使整個人類都幸福地生。（生的哲學）所以同類相殘是違反宇宙之「生」的本意，終必自取滅亡，因手張互助互愛。（愛的哲學）更應合羣力以征服自然，統御宇宙，發揮人類天賦特大的生命力以登全人類於幸福康樂之境。（人的哲學）。總說得好：「宇宙萬物都是為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所以我們就是宇宙的主宰。我們要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進全人類的生活。惟其如此，才可以找到並增進我們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以至無窮大樂。」

限久。」

吾人應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當擴
大胸襟，何必「間形骸而分爾我」？程顥說：「仁者以天地
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王陽說明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其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猶
一人焉。」明乎此宇宙之大道，自然無彼己之分，物我之見
，匪特「親親而仁民」，抑且愛物使得其用，仁愛之心必油
然而生，互助利羣之念與積極服務之精采亦必相因而至，「
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有所不容已。」服務的人生觀不立而
而自立了。

三 人類進化的趨勢

其次，從人類進化的途徑來探討。——總理會說：

「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為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
為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之時期。……
……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

這是互助的人類進化。證諸史實，確信無疑。在原始洪
荒時代，人與野獸同生共處，人要求生，野獸也要求生，人
無爪牙之利，究何所恃而戰勝野獸呢？此不能不歸功於人類
祖先的互助精神，合羣力以維持人類生活的地位和發展。之
後，人類互助的範圍日益擴大；由家族而部落，而民族。以
社會國家為互助之體，以仁義道德為互助之用，將來還要達
到大同世界的境地。西哲飛喜推預測說：「人將不以私意互
分界限，人之權力亦將不消耗於互相攻擊之中。」「文明的
，自由的，有普遍和平的大國將漸積而包括全世界。」可見

人類的互助乃是自然的趨勢。但同時也是必然的結果。因為
人類愈進步，則分工愈細微；則人類愈見不能違反互助之原
則。羅素說：「因為科學已經造成這樣的境地，人類不是必
然的共生共存，就必然的共同走上死滅的道路。」

歷代大儒會一再說明人生而有仁心，叔本華也以爲「人
雖爲欺瞞之網所包，於人我之間情分界限；而於見他人受苦
之時，則鮮有不動心者。人有同情心乃是事實，即惡人常以
害人爲事，在其意識之最深處，亦未嘗不自恨其所爲，未嘗
無悔恨之情。」此與孟子之說正相吻合。意大利復興大傑馬
志尼也說：「人是那些別於禽獸的特性——合羣的傾向，
學習的能力，進步的材性——的。……在任何地方有這些
特性，那兒就有人性。」人性畢竟與禽獸之性不同，人類的
進化以互助為原則殆為理所當然。

惜乎一般人妄以物種進化之原則來解釋人類進化；認自
然界為一廣大的戰場，流佈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觀念，以
為強權即是公理，全部歷史都是鬥爭，正如赫胥黎所謂：「
一切生物的口爪都帶着鮮紅的血！」可是，克魯泡特金曾經
舉出許許多多互助的證明；首創生存競爭之說的達爾文也未
敢否認互助的事實，他說：「就在自然界本身中，還有事實
與互相競爭相並行，而其意義則與互相競爭迥異，即同種間
的互相扶持。這種事實或較前者為重要，因為這是種種福利
與種種保存上所必要的。」固然，在今天人類尚有鬥爭侵略
的事實，但這是社會的病態和國際間的罪惡；這是人類獸性
還未盡脫的緣故。我們應該給以最厲的糾正與堅強的打擊，
使人類重返於互助的坦途！

總之，「人類自入文明以後，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到人類進化之目的矣。」順着人類的本性，應乎進化的趨勢，吾人自當「勉求學問，琢磨道德，以引進人羣，愚者明之，弱者強之，苦者樂之而已。物競天擇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非互相匡助不足以自存。」故服務的人生觀才是人類共生共存的大道。

四 中華民族的美德

復次，從中華民族的特性來探討。儒家思想幾千年來始終配着這個偉大民族，而儒家思想的中心直可以「仁」「義」二字概括之。

所謂「仁」，有廣狹二義：狹義的仁即慈愛，廣義的仁則統攝諸德；如博愛（「仁者愛人」）博愛之謂仁。」利澤（「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忠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克己復禮謂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忠孝（「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勇爲（「仁者必有勇。」）勿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等。故知所謂仁者，亦即今之所謂「服務」。

禮記禮運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伊尹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中庸上說：「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孟子說：「耆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都明示服務的思想。故人生不僅要「修己以安百姓」，及「百始昭明」，還要「協和萬邦」，最後達到「天下爲公」，才算是「大道之行。」這種仁愛的道德，正合乎前述宇宙的大法。故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美德，尤其是全人類將來所應走而且必然要走的道路。

義者宜也。故義是正義的感覺，行爲的正軌；由牠可以解明人類互相間的關係以決定其義務。換言之，義即是人類的義務感。「蓋正義對於人類提出種種義務；義務之客觀性爲正義，正義的主觀性則爲義務。」無論何人在其心之深處均有正義之感，因而亦有義務感。人之所以爲人，也正因此有此種義務感。人盡其義務是神聖的職責，良知的驅使，廉德稱之爲「道德的至上命令」，凡人皆無所逃於其外。人生的意義也就在此。中國古聖先賢早悉此義，故不憚以義務再四愷切垂詢：尙書皋陶謨有「五典」之教，禮記王制又舉「七教」，中庸乃有「五達德」，到孟子轉爲「五倫」，漢董仲舒有「五常」之說，唐韓愈倡「六倫」之義。凡人在社會上之一切地位，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友，長幼，賓，主等等皆明定其義務，而未嘗言及權利。每與西方之重權利截然不同。權利對己而言，是利己的；義務對人而言，是義他的。義務使人平，權利使人爭，爭則禍亂無已日。故義務本位是文化的頂點，是人類必由的正路，固不僅爲中華民族之美德而已。

相應着這種仁義的王道文化，我們應採何種人生觀呢？

五 國家社會的需要

最後，試把服務的人生觀推之於國家社會而觀其結果。前面已經說過，互助才是人類共生共存共進的大道。然而現世界正存在着兩種鬥爭形態，牠們不但阻擾了人類更進一步的互助，失去了人類更高一級的幸福，毀滅了人類血汗所創造的文明，而且還要毀滅人類自己。那就是國際戰爭和階級對立，要使人類幸福進步，非銷滅牠們不可。

如何才能銷滅國際戰爭呢？自前次歐戰以來永久和平爲舉世所渴望，各國政治家有過種種的努力如國際聯盟，軍縮會議，集體安全制度等。但是，誠幾何時，戰爭的烽火又燎原而起了。從前的努力都成了泡影！蓋戰爭之根源在於人類只知利己不知愛人，只知爭奪不知創造。捨本逐末，無濟於事。惟有服務的人生觀是博愛的，創造的，互助利羣的，故能治其病根。使人皆抱定服務的人生觀，則此種王道文化將逐出一切侵略行爲於人世之外，造成一和平幸福的世界大國。

如何才能銷滅階級對立以達到理想和諧協社會呢？階級鬥爭祇能造成循環往復永無上境的壓迫關係和鬥爭行爲，並不能得到問題的解決。祇有人皆去其利己心，建立義務心，各盡其力以爲社會服務，則天生不平的人類亦可以得到真正

的平等，於是一切階級都歸泯滅，整個社會才能真正協調。這才是解決此種問題的根本方法。五來欣造在其儒教的政治哲學一書中說：「西洋有階級鬥爭，遂發生社會主義，擾亂社會和平；何以東方能由階級之調和支配數千年之文化，毫無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之痕跡？西洋歷史如馬克斯所言：『人類從來之歷史皆爲階級鬥爭之歷史。』何以東方之歷史爲階級協調之歷史？蓋西洋方面，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皆主張權利，除利己外，別無他事。反之東方則上下各以義務爲重，而上層階級之義務尤較下層爲重；東西文化之差別其秘密即在於此。」五來氏更進而證明西方文化也漸走向東方之路了。可見服務的人生觀確是救世的良藥。

六 結語

人生的正鵠是什麼？從宇宙的大法來看，從人類進化的趨勢來看，從中華民族的美德來看，從國家社會的需要來看，千言萬語歸根一句，就是服務。惟有服務能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惟有服務能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也惟有服務才盡光大我們的人生！

對於世界和平之認識

張道行

自從羅斯福於二月七日宣佈遣派副國務卿威爾斯赴歐訪問以來，世界的視線都注意到歐洲和平的恢復問題了。威氏

於同年十七日由美動身歷訪意德法英四國當局及其在野領袖，其全部旅行已於三月底結束，但其任務能否完成？却是個

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羅斯福此次派遣威爾遜，雖說旨在探詢各國對於戰後問題的意見，而其實際則在於尋求調停歐戰的基礎，乃為衆所週知的事實，但因無確實把握，所以在表面上屢屢否認此點。猶憶一九一五年時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曾正式派送其親信霍斯赴歐要求德與英法停戰，并對德奧兩國明言，如不接受美國的建議，美國即將被迫參加英法方面作戰，迨霍斯的調停失敗之後，美國也就終於參戰了。羅斯福對於這件事，當然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這次不肯作如此前進的冒險。

羅斯福對於戰後問題的解決，僅僅提出了兩點，(一)為裁減軍備；(二)國際經濟的調整。關於第二點，依威爾遜於三月十一日所交當時法財長雷諾(今內閣總理)的備忘錄中所示，其要旨不外如次：

(甲)健全的國際貿易關係，乃國際幸福，與永久和平必不可少之基礎，國際貿易必須准許每個以及任何國家，可以取得世界各地的資源，不得限於本國的領土範圍之內，至對每個國家的過剩生產，也應無歧視的予以開放。

(乙)國際貿易若為含有排他性的或歧視性的雙邊協定所阻止，或為過高關稅，比額制度或物之交換方法所作梗，則不易發達。這些限制，便是經濟戰的不足。最近的經驗，明白表示對於平時國際貿易的惡劣影響和對於各國生活水準，及經濟利益的減低，同時也是國際敵視和衝突的源泉。

(丙)如果經過此次戰爭之後，世界必須再度建立於穩固和平的基礎之上，并祛除仇恨和恐懼，以為經濟進步造一出

路，則對於國際貿易必須重樹健全的方法，這些包括逐漸取消，對於貨物流通所加的不合理而過分的限制，推行一種無歧視的最惠國經過辦法，和創造一種國際信用的條件以為多邊貿易之用。

威氏這個計劃本來是近年來許多國際經濟學家之所主張，在理論上當然是有很好的基礎，恐怕在實行上，要有許多的困難發生，意大利不早已表示了原則的贊同嗎？但堅稱任世界資源沒有平分以前，「無」兩國家不能與「有」的國家自由貿易，因為如此則必致愈弄愈窮。

至於裁軍計劃羅斯福和威氏，都沒有具體的提出過。這個問題本來喧嚷了二十年，可是直到現在一些沒有結果。不過有一點必須提出，那便是法國所表示要德國保證以後歐洲各國，不論大小都無遭受威脅之感，而後法國才可與德言和。這不是說在安全沒有保障以前，法國反對裁軍嗎？這當然也是一種老調重彈，可是裁軍的最大難關，即在於此。

所以以為美國這兩個提案，雖然很切實際，但在西歐前線沒有經過大屠殺以前，各交戰國很難同意此類方案的實施，惟其如此，美國此次的努力，大概也會和一九一五年時情形一樣的無結果。

不過，我們假若進一層推究，就是這兩個提案，也不是根本解決國際衝突之方。英美的學者，近來專於世界的改造方案，有許多的意見發表。就中值得吾人注意的有下列二種：

(甲)美國紐約時報駐歐記者斯特力(Sturges)主張北大西洋十五個民主國家組織聯邦，即英、美、加拿大、澳洲、新

西蘭、南非聯邦、愛爾蘭、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在國籍，武力，關稅，貨幣和郵政交通五方面連合起來，成爲一個民主國家。這個新國家的政府與現時各該國的政府一樣，其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和國聯之爲政府間的政府不同，他以此偉大的聯邦，無論在人口，土地，資源，武力，各方面，都可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而她們又是崇尚民主愛好和平的國家，既不去侵略他人，不可示他國以範式，將來可把其他各國吸收進去，慢慢的達到世界聯邦之階。

(乙)很顯然的上面這個計劃，是把國際聯盟完全撤開。這一點是爲另一美國作者，奧卜，紐芳 (Oscar Newfang) 所大反對，他以為除了增強國聯的機構之外，別的方法都不是保障永久的和平。至於如何增強國聯的機構，他提出了三

敵國戰時金融之危機

敵國自發動侵略戰爭以來，無論在政治，軍事，外交，乃至經濟上皆伏有重大危機，且隨戰事之無限延長，益趨於深刻化。惟本文單就敵國戰時金融狀況，加以檢討，藉觀其崩潰期已否到臨。

戰時金融問題之焦點，不外對內滿足國內物資之真實需要與對外充實國外購貨之支付工具。前者爲如何籌集產業資金推動生產計劃，如何使公債發行與國民所得保持適當比率

點具體的意見：(一)大會改爲世界議會，大多數的投票可以決定一切；(二)國際法庭應對國際任何爭端，都有強制的法權；(三)理事會變爲真正的行政機關，擁有軍隊和征收稅款的權力，總而言之，把現有的國聯改成世界聯邦。

上面這兩個計劃都是很好，可惜史氏只注意了世界問題的一部份，而在實際上「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一部份之利害即全體利害」。若欲勉強劃一鴻溝，以隔絕疫癘，乃是不可能之事。至於紐芳的建議，乃爲二十年來多數思想家所提倡，例如英國之羅素，及諾爾巴卡都主張國際應該有軍隊，法國政府，更是一貫的作如此的主張，所以問題的結核，乃在於各國政治家是否有此醒悟！果爾則到世界和平之路，無人能加以阻塞。

羅遠才

以及如何使通貨膨脹與經濟發展互相適應等等；後者爲如何發展國際貿易，爭取外匯資金，以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等等。七七事變以來，敵國在金融方面所採之措置，要亦不外以上諸端，而其逐步演進，則可分爲下述四個階段：

(一)自戰事爆發至該年底爲第一階段。當時利息高升，債價低跌，產業界需金孔急，金融市場則極度疲憊，敵國政府爲緩和此種滯澀狀態起見，乃採用信用膨脹政策，俾可放

出大量資金，以助市場活動。具體辦法則為降低日本銀行公債担保放款之利息，擴大公司債券之担保放款，提高保證準備，採行預付制度，擴張興業銀行及大藏省儲金部之放款範圍等等。

(二)一九三八年春至該年底為第二階段。和平既渺不可期，速戰速決更不可能，適值國會通過龐大預算，困難重重，矛盾百出，如外匯供給減少，公債消化與產業資金不能兼顧，紙幣增發引起物價漲等等，皆為敵國無法應付之難題，但亦不能不設法求程度上之減輕，於是如調整資金用途，實行強迫儲蓄，設置外匯基金，樹立易貨制度以及獎勵黃金生產，收購民間存金等，至此統制色彩乃益顯著。

(三)一九三九年初至九月歐戰爆發為第三階段。重要城鎮雖已相繼佔領，而戰事前途仍屬茫茫。是時侵華戰費日益增加，龐大預算無法平衡，加之國內經濟矛盾現象愈出愈奇，際此已不能單靠在國內加強金融統制，而欲轉移目標向我淪陷區積極採取，如敵鈔軍票之強制行使與收集法幣以套購外匯，二者皆為此時之重要政策。

(四)去年九月迄今，則為第四階段。歐戰爆發，英鎊實行貶值，英鎊集團大受影響，敵國為避免無謂損失與便利貨物輸出計，乃放棄日圓與英鎊運繫而轉繫于美元。同時美國宣布廢除商約，策動禁運軍火，日法商約又將滿期，貿易勢必減退，凡此皆於敵國非常不利，敵國鑒於自給自足之需要，復欲實施全部總動員法，貫澈生產擴充計劃，並擬在貿易上以蘇代美，打破國際封鎖之難關。

以上係按其實施先後作上種歷史之敘述，但猶未道及其

經過與結果。茲為明瞭敵國戰時金融之全貌起見，特再從戰費與公債，產業資金問題，通貨與物價，獎勵儲蓄問題，以及國際收支平衡諸方面一一加以分析：

(一)戰費與公債——七七事變後，敵國財政支出激劇膨脹，一九三六年預算僅為二十三億七千三百萬元，但至戰事爆發之一九三七年已達五十四億四千四百萬元，一九三八年增至八十四億元，一九三九年再增至九十五億元，本年度預算竟達一百零三億六千萬之鉅，(連追加及拓務預算在內則為一百六十億)，其中關於戰費一項，在一九三七年年度一般及特別軍事費合計三十九億六千萬，一九三八年年度一般及特別軍事費合計六十一億元，一九三九年年度一般及特別軍事費與預算外國庫開支合計七十三億六千餘萬元，至本年度各項軍事費則預計為八十三億六千萬，以上各年軍事費加上實際上與戰事相關之支出(約十二億以上)，約共二百七十億元，單就特別軍事費一項言而即有一百八十億元，較甲午戰爭時代全部戰費二億圓超過九十倍，較日俄戰爭時代全部戰費十七億圓，亦超過十倍以上。考此項鉅額戰費之來源，幾全恃公債之發行，良以近年來敵國租稅與公債所佔歲入總額之比率，已起重大變化，戰前一年(一九三六)租稅所佔歲入之百分比為五五·二，而公債僅佔二五·七，迨至戰爭第三年前者已降至二八·七，而後者漸增至六三·七。同時一九三七年三月敵國公債發行總額共一百零五億七千餘萬圓，一九三八年三月增至一百二十二億七千餘萬圓，一九三九年三月增至一百七十三億五千萬圓，本年三月底已達二百十五億，再加上去年度應發未發與本年度預算中規定發行

共約九十四億，則至明年三月底敵國公債發行總數將超過三百零九億圓。至於公債之消化情形，表面上似漸好轉（一九三七年消化率為五五·五，一九三八年增至八九·二），實際上日本銀行之公債保有額愈積愈多，而且所謂消化，一半仍在官廳，郵局，大藏省儲金部以及市面金融機關手中，真正消在民間者極少。此種大量發行與消化呆滯之情形，勢必使產業資金，無法擴充；通貨數量，加速膨脹。

（二）調整資金問題——敵國欲貫徹其侵略野心，則首須擴充軍備，而為滿足擴軍需要更不得不增加生產設備，在此迫切要求之下，歷年來產業界之投資數額，確有逐漸增加之勢。不過推銷公債既需大量資金，擴充產業又賴資金灌注，以敵國有限之實力，礙難同時應付。戰事初起，因一方面嚴厲執行匯兌管理，一方面採用信用膨脹政策，產業資金之籌措尙不成問題。其後戰事延長，軍需日繁，同時民間資金多為公債所吸收，故產業界形成空前未有之窘象。敵國政府其一九三八年九月頒布「臨時資金調整法」，對金融業之投資加以適當統制。規定禁止或減少其對和平產業放款，而專以軍需工業及輸出品之業為放款對象，並授權興業銀行將債券發行額由五億擴大至十億（後因預備實行總動員法第十一條，再增至卅億），責成該行辦理戰時金融及命令放款等重大任務，凡此皆在阻遏資金之自由流動，而導其注入國防產業。又除在日本銀行設立「資金調整局」外，復在商工部設置「物資調整局」，由雙方合作來執行生產力擴充計劃與物資動員計劃，實施結果，許可設備資金雖增至七十億元（可否籌齊頗成疑問），但因勞工原料之缺乏，生產力並未增加

，且因一般和平產業多被犧牲，釀成目前各種物資之饑饉，尤以糧食、煤炭、電氣等項之恐慌，將致敵國工業之死亡，為將來革命暴動之導火線！

（三）通貨與物價——戰前日本銀行紙幣連朝鮮台灣紙幣及輔幣券在內，合計十八億二萬千元，較九一八事變一年僅增一億八千萬元，可見膨脹程度甚緩。戰後以公債陡然增加，日本銀行既負承兌銷之責，則為使公債容易消化，不得不增加紙幣發行，提高人民購買力。一九三七年底各種紙幣總額已增至二十四億八千元，一九三八年底再增至三十三億，至去年底竟達五十三億三千餘元，約為戰前之三倍。此次在市面流通之紙幣，雖曾用公債與儲蓄兩種方式收回一部，但旋即放出，至此乃不得不將保證準備發行額一再擴大，由十億而十七億再擴大至二十二億，但實際發行額仍超過準備限額之一倍（現金準備五億元，合計二十七億），金準備率不得不再降低，逐漸走上惡性通貨膨脹。再者敵國各種物資本已極度缺乏，益以軍需用品之徵購，通貨數量之增加，早使一般物價呈不斷飛漲之勢。敵國政府雖在治本方面努力擴充生產，節省消費，在治標方面設中央物價委員會，負取締暴利，制定公平之責，終不能有所成就，尤難禁黑市猖獗。據人調查：敵國平均物價較戰前漲三四倍以上，目前每月皆漲百分之三四十，似此情形，不特一般人民生活感受重大威脅，政府財政支出亦將同受其累，舉例言之，本年度預算共計一百零三億六千萬元，係以前年八、九、十三月物價指數為基準編制而成，然此刻物價已較彼時漲二分之一，將來實際支出非在一百五十億以上不可，彌補之法仍不外增發

公債，但又勢必引起紙幣增發，物價飛騰，支出增加，如是循環流轉，愈演愈烈，真不知伊於胡底！

(四)獎勵儲蓄問題——獎勵儲蓄之目的，端在解決上述三種困難，實言之，即欲藉國之民儲蓄增加，去消化鉅額發行之公債，供給生產擴充資金，並收回流通之紙幣，壓低物價之漲勢。敵國之儲蓄運動開始於一九三八年春，蓋因是年消化公債需要資金五十億，擴充生產需要卅億，為籌集八十億之鉅大數額，遂有儲蓄之發生。實施方法暫以各公私團體為單位，結成儲蓄組合，規定自由獻金或從薪給中扣除若干，實行強制儲蓄。年終成績尚能達七十億，可謂差強人意。去年儲蓄運動以一百億為目標（公債消化六十億，生產資金四十億），情形格外緊張，其策勵方式為擴大儲蓄宣傳，動員婦女團體，增加儲蓄組合等等，據說年終成績將近九十億，似有突飛猛進之勢，惟此項數字係由敵人估計，殊難令人置信，縱然事屬有據，但其中若干部分乃係受物資動員計劃所限制之產業資金，由生產界匿跡後再轉入儲蓄形態，故論其性質，頗不健全，焉得恃為樂觀之根據？再看敵國近年全部國民所得往往有百分之六十為政府所擷取，資金積蓄有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為公債所吸收（一九三八年國民所得與歲入總額之比為五九、六，公債收入與資金積蓄之比為七六、二）。敵國雖已盡竭澤而漁，抽精吸血之能事，但以有限的虛偽儲蓄，斷不能解決財政金融上之困難。

(五)國際收支平衡——敵國經濟患有先天貧血病，對國際之依賴性極大，平時軍需用品之輸入猶可賴敵貨輸出以相抵償，一至戰時，和平工業全部萎縮，輸出大減，而軍火

需要迫切，輸入增多，遂形成鉅額之貿易入超。為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則只有輸出國內現金。自開戰迄去年底，敵國對第三國貿易純入超為廿一億六千餘萬圓，每年平均入超六億至八億，不可謂不驚人。同時敵國在戰前存金共五億四千萬元，重新評價後伸為十四億，兩年半中新產金約四億圓，動員外幣債券約二億圓，在國內及我淪陷區搜購套匯又得數億圓，合計在廿二億左右，僅够抵補貿易入超。據敵國藏相報告，一九三七年中輸出黃金八千六億萬元，一九三八年輸出六億六千萬圓，連去年及今年春輸出在內，至少在二十億以上，可見敵國存金行將告罄。敵國前年曾由金準備項中撥三億元充外匯基金，實行連繫制度，以補助輸出工業，但受益者僅為軍需商人；餘者以資本，原料，工人之缺乏，竟致一籌莫展，增加輸出，殆成幻想。另外黃金生產已不能再增加，收購亦達最大限度，故就敵國國際收支平衡上觀察，足證其絕難支持長期戰爭。

總括以上所論，吾人深信敵國戰時金融，斷無出路可言；戰費預算與公債發行早達飽和點，物資缺乏與通貨激增已構成惡性膨脹之變柱，而以物價飛騰之姿態出現，至於儲蓄運動根本不能拯救金融恐慌，外匯基金之枯竭與國際收支之本趨不利更將加深恐慌之程度。目前敵國政府雖仍在籌劃種種彌縫方法，圖作最後之掙扎，但觀乎公債發行與產業擴充之矛盾益深，通貨膨脹與物價昂貴之與時俱烈，恐不待我施行軍事反攻，將由惡性通貨膨脹之開端，促成敵國經濟之總崩潰矣。吾人拭目待之！

進退維谷之日本經濟政策

Miriam Farley 著
王 森 譯

歐洲戰事的爆發與外交上的轉變使日本的處境大變，於是它整個國家的戰略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此次歐洲戰事，日本有好些政治家早已料及並且希望政治上與經濟上皆能收漁人之利。但經濟上日本還缺乏漁人的工具。

我現在假定歐洲的戰事，如一般人所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即戰爭將延長，經濟上的拚持亦將與前次同樣廣大而長久。

若此次戰爭果為二次大戰，它在某幾個重要的特點上，尤其是遠東方面，與第一次大戰有所不同：此次戰爭雖與上次大戰同樣是列強政治的衝突，表現出觀念上的差異：即在爭奪帝國的地位；但與上次大戰爆發的方式不同，不是一下子一起爆發出來，而是逐漸的發生；它不是開始於一九三九年的九月，而是早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即日本進兵中國之時。這個段落至今尚未終止；並且正在最重要的階段中，第二個段落始於德國之進兵波蘭，這兩個衝突幾乎完全各不相干：一方面的交戰國對他方面而言，是中立國，只有美國意大利與蘇聯才對雙方都是中立國，至於將來合縱連橫的結果，或許會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但就現在而論，日本除中國外對世界各國都處於中立地位，因此外交上商業上它都可根據自身最有利的途徑來決定政策。

此次大戰與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對日本最不同之處是：現在日本本身已十足的是交戰國了，第一次大戰時日本因

英日同盟的關係亦算是協商國之一，但實際上仍是中立的成份居多，它參與戰爭而起的損失很少，而因戰事所獲的利益甚多，因此第一次大戰使日本經濟繁榮，它對歐戰的態度亦與美國相倣，大致是處於中立的地位。

現在日本一方面是中立國，同時又是交戰國，因此處於一種進退維谷的地位：一方面它想借此機會，乘中國的諸友邦無暇顧之時，更努力從外交上軍事上貫徹其大陸政策；同時又想做照第一次大戰的情形，利用歐洲各交戰國因戰事而放棄的市場，發動經濟力量，攫取世界的商業利益。但不幸這兩種希望不能同時並進。

第一次大戰對日本的經濟等於注射副腎腺劑使全身筋骨都顯得活躍。一九一三年與一九一八年之間，日本出口貿易在價值上增加三倍，數量上亦增加一半，進口量也相當的多，不過比較起來出口貿易仍處於有利的地位，但是戰後一九二〇——二一及其後，交戰國恢復正常貿易，日本很多宗出口貿易因此終止，日本因大戰而得的國外市場，尤其是亞洲南部，拉丁美洲與非洲等地，亦因此喪失。

第一次大戰的需要使日本工業得到加速度的進展，新的工業因新的需要而興起；舊有的工業如鋼鐵化學造船紡紗亦因此在技巧上產量上有極大的發展，原動力的應用量增加了一倍，利潤亦因此而有到達百分之百者（不過當時東京實際工資降低百分之二十）。此外尚有海運及其他種種收入。

以所日本得到償清外債的能力，並且戰後更一躍而為債權國。

日本整個歷史過程中，人口的增多與出產的增加無時不在競賽。而第一次大戰使日本的生產力大為增加，所以日本之真正趕上時代可說是大戰之賜，固然，戰後的不景氣亦使日本蒙受損失，當時經濟上因這種不正常的發展而引起的緊張狀態，至一九二七財政危機以後始趨平穩，然而日本工業之能盡量發展，國際貿易之得到基礎，實是一九一四——一八年之間它能超脫大紛爭而收中立的經濟利益的結果。

而現在在日本的情形已與一九一四年不完全相同。除它本身現在正從事戰爭外，其他還有好些不同之處——有些對它有利，有些有害：一九一四——一八時日本正式踏進工業時代，而現在它在工業上可說已達成成熟時期。它的商業與財政的機構已很有效的組織成功；它的海上商業已得着很好的發展，它對世界大部份市場的聯絡亦已建立起來。

但同時現在在日本國外貿易的障礙亦遠較念五年前嚴重多了，有些障礙是因一九三二——三七年日本貿易太旺盛的結果，專為對付日本而設的；同時也有些是世界經濟國家主義化的結果，有幾個購買日本出產品的國家與第一次大戰前的日本一樣，本身在開始工業化中，因此他們的進口貨將因本身工業的發展而減少，並且日本對華作戰二年亦使它國外貿易蒙受重大損失，各地因對日本發生惡感而普遍發生的抵制日貨運動使日本財源蒙受嚴重的打擊。

不過，假使日本會利用的話，也未始沒有發展出口貿易的機會。而充分利用這種機會，日本必須先根本改變它二年

來的經濟政策。

現在日本一方面因為軍火工業，同時為了發展滿洲與中國的關係，對工業與貿易均作嚴格的戰時統制，只有為供給海陸軍或合乎國策的企業才許得到外國以購買原料或機器，資本與勞工也都偏向這個方向。物質缺乏與通貨膨脹的結果，使日本一般物價在世界水平線之上，致使生產增加，對外貿易的競爭力減弱，如原來為海外貿易而航運的船隻現在都用來運輸軍隊或貨物到中國，總之，一切平時的工業都因戰爭的需要而犧牲了。

因此日本在日圓經濟集團以外的貿易已蒙到嚴重的損失，不過在日圓經濟集團以內的貿易則因滿洲與中國淪陷區域的物價更高於日本之故而有相當的進展。因此沿海與內河航運事業頗有發展，日本很希望由此建立起一個單純的日圓經濟集團，但是惟其如此，日本在世界商業上的地位大為減低。

日本不斷入超的結果，其金準備已降低到危險的地步；又因中國事件之故，它在海外的信用亦大為跌落，並且歐洲戰爭很可能使它輸入方面緊張程度更加加深；世界的物價漸漸加高，日本戰時必需的入口貨亦日漸困難，日本在中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使它軍隊物資上運輸上的需要更大，因此現在日本出品工業所必需的外洋原料品，除非它中止在大陸上的行動，實無法擴展。

第一次大戰期間，日本在世界市場上得到很可觀的勝利，假使它現在想再得到此種勝利，就必須將它的資源與力量集中這個方向。而現在它的資源與力量集中於一個完全相反

的方向：企圖用武力征服中國，俾在東亞建立所謂「新秩序」。此種企圖與前一種目的——國家的繁榮與安全——背道而馳，它現在正想用地域經濟來替代國外貿易，即思建立起日滿支經濟集團來。

但是現在在世界市場的好機會不會使日本放棄軍事擴展的企圖而轉向繁榮商業之路呢？無疑的，現在也有幾種壓力在趨使它踏上此路。它國內靠國際貿易營利的財界不斷的站在保守派方面不贊成對大陸作軍事的冒險，不過也有些財團發了戰時財，以致態度改變的；其他因戰時經濟而最蒙害的小製造商與貿易商則又無法表示他們的意見，然而中日戰爭以來國際貿易竟大大降跌，一般人對恢復出口辦法的熱望很高。事實上，一九三八年夏天已在這個方向發軔了一個政策，即著名的「聯繫制度」，希望國外貿易脫離戰時統制，其目的亦無非在換取外匯以供軍事需要，（因日圓集團並不能供給外匯）。但結果成效不多，尤其是綿織物方面。於是另謀出路的呼聲復起，其後即集中於由政府設置專司出口貿易的機關——國際貿易部。同時商人亦希望有其分子參加此部內決定政策的評議會。

日本軍部當然也想擴充輸出額，他們也已知道實現他們的野心所必需的鋼鐵、石油、機器必須用大量的綿織物，玩具等去換得。但現在在日本自己將自身處於進退維谷之中，它可以得到鋼鐵，或者得到棉花，但是不能同時得到兩者，它只有使本國出產的棉花或鋼鐵來替代，但至今日本仍不能填補這個差額。

日本要想開發國外市場而不礙它在中國的行動簡直是不

可能的事。不錯，世界總市場正在興旺中，這可以作日本大宗收入的來源。但美國對綿市並不繁榮；並且新發展的綿的替代品正象徵着前途的惡兆，其他用日本本國原料製造的出產品——如磁器罐頭魚羊——雖亦可作國際貿易的資源，但這些工業也不得不分軍事工業的力量，於是又只好更進一步的減少國內的消費，以此種所得銷售國外。

預料日本或將繼續從事填補國際收支的差額，它對中國的政策已宣告不能中止，實在，它已成騎虎之勢，欲罷不能，故在目前經濟上進退維谷的狀態之下，它或許會傾向繼續以對華為中心目標，同時對商業利益表示幾分讓步，以盡量取得商業上較優的地位。

日本經濟政策乃根據政治路線而決定——同時兼顧其他列強的政治路線，魯因戰爭而影響商業活動的程度，亦受中國各友邦之影響——尤其是美國與蘇聯，美日商約終止以後美國將採何種步驟，現尚不知；蘇聯目前之政策亦尚不十分明顯，日本或者會以承認其在華「特殊地位」為條件，將淪陷區域經濟利益開放一部份；但這也非很容易的事。

日本目前不能同時向兩個方向去發展，它要土地，就不得不放棄貿易；要征服，就不得不放棄商業；要中國，就不得不放棄世界。現在它已選定中國，但是能不能成功？這正是它的苦悶。

(完)

倭寇侵奪下的美國對華貿易

John Ahlers 著
汪統先 譯

在華的美國商人，對於上海工部局事件以及汪逆偽政權之建立等，都應該加以密切的注視。因為大部份美國對華的貿易，目前都是集中在上海，而且從未像目前這樣的完全集中於上海。所以上海以及鄰近上海的各地局勢之變遷，都會密切地影響到美國的商業利益。

中國今年的頭一月中，自美輸入的貨物計值七·〇六九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輸出至美的貨物計值四〇·〇三二〇〇〇元，總計美國對華的貿易，共佔中國進口的百分之八點四〇，佔中國出口的百分之二四點七九，僅上海一地的貿易額，即佔此種貿易的五分之四。今年一月從美國輸入上海的貨物計值五·二七一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佔美國對中國整個進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同月份上海輸出至美國的貨物共計三四·四〇四〇〇〇元，佔中國輸美貨物的百分之八十五。

今年一月份約中美貿易關係，較之去年一月份大有增加。在上海一地，計出口增加了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進口增加了二·八〇〇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在上海港口由美輪裝運的貨物今年仍表示只佔很小的數目（一月份為六九·三〇〇噸）已較減到在中國海岸全部外國載貨的百分之三點五的不重要地位了。目前現在對華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生棉。由於美國對於棉出口給以津貼，以及歐戰對於印度棉花的不利影響，使得

北美的棉花對於中國紡織業的供給，重又取得以前的重要地位。去年一月中國自美國進口的棉花計有一千二百噸，自印度、埃及、及巴西等進口的棉花計有八千五百噸。今年一月份中國自美國購進的棉花計有八千四百噸，自其他國家購進的棉花只有一千八百八十噸，美棉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七倍。目前美棉的供給佔中國所需外棉的百分之七十，佔上海所需外棉的百分之七十五。同時美棉對中國的輸入，主要亦是由於有上海的紡織工業的原故。

今年一月份中國輸入的美棉，計有二·七九三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其中有二·六二〇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棉花即在上海當地消費。此種美棉的進口，佔中國總進口的百分之四十，佔美國對上海進口的一半。由於中日戰爭，特別是由於日本在中國佔領區內所引的貿易及匯兌的統制，以及排斥外商利益的種種商業上的限制，使得今日的中美商務關係，較之戰前大有遜色。目前美國對中國進口的棉花、煙草、石油、及其他金屬等，總共一起才約佔戰前美國對華輸入的百分之七十五。

今年一月自美輸入的貨物，主要是礦物油類，計值八二·〇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其中有五二·八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的貨物是途經上海的。較之去年，美國石油的輸入已有很大的減少。美國煙草的輸入更減少了五二·〇〇〇元，海關金單位。今年一月美國煙草的輸入計值只有八三·〇〇〇元，海關

金單位。所有這些煙草的輸入，都是途徑上海。計佔上海煙草總輸入的百分之九十，佔全國煙草總輸入的百分之八十。一月份自美輸華的金屬增加了三三三·〇〇〇海關金單位，計值共有七九八·〇〇〇海關金單位，大部份即在上海出售。此種增加，首先是由於在華所售白鐵器皿由二五六·〇〇〇海關金單位增至四三六·〇〇〇海關金單位，其次是由於在上海買進一一四·〇〇〇海關金單位的釘類，此項貿易在一年以前還是完全沒有的。一月份進口的其他美國物品，根據海關的統計，列表如下：

全中國海關金單位	上海海關金單位
車輛	四四二·〇〇〇
機器	二〇五·〇〇〇
染料	一九六·〇〇〇
化學用品	一八四·〇〇〇
食料	一四八·〇〇〇
金屬品	一一八·〇〇〇
木材	一二五·〇〇〇
紙張	八一·〇〇〇
皮革	五三·〇〇〇

上海在上述各物品進口中特佔重要的是化學用品，染料，金屬品及紙張等。前兩項的物品，美國近月來對華的輸入特別增加，主要是代替了因歐戰關係不能輸往遠東的德國物品。所以美國在今年一月份較之去年一月份在上海售出的染料增加了一倍。輸入的硫黃增加了四十倍。在上海進口的全部染料中，美國要佔百分之二十七。

在車輛方面，美國仍佔上海進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但與佔中國全國進口的百分之四十七。日本在這方面的競爭雖然很緩慢，但是一直在增加。美國在今年一月份輸往中國的汽車及摩托車等共計三一輛，計值一五四·〇〇〇海關金單位。自日本輸入的只二八輛，計值二二·〇〇〇海關金單位。在與引機的進口上，日本有二一七輛，美國只有一一九輛，其價值兩方面差不多。摩托車輛的進口，日本要佔美國的二分之一。中國的紙張市場，完全為日貨所統制，只有一部份繪畫，印刷鈔票，及公文用紙等，美貨的進口尚佔有百分之六十七（在上海要佔百分之九十三）的重要地位。

在三月份中國輸美的出口方面，仍較進口方面少有變化，在出口總值的四〇·〇三二·〇〇〇元中，僅紡織品一項即佔二五·六八八·〇〇〇元，即佔百分之六十四。生絲佔紡織出口品的重要部份，計值一九·六三四·〇〇〇元，共佔全中國對美出口的一半。其餘係毛織地氈，棉織長短襪，廢棉，羊毛及呢絨等。所有紡織品的出口都途經上海。今年一月份生絲對美出口行情特別例外，竟達每磅四億元之多。自此後，中國生絲在紐約的市價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生絲出口的價格，一時竟無提上一月份紀錄的徵象。

中國對美的出口，仍以動物產品佔居第二位。一月份此類的出口計值共四·八六一·〇〇〇元，佔輸美貨物的百分之十二。其中主要種類係豬鬃（計值二·九九八·〇〇〇元）以及豬腸雞蛋等。皮毛等輸美的出口計值三·二三九·〇〇〇元，佔第三位。其他出口值得提出的是草帽（一·四〇七·〇〇〇元）藥物原料（一·〇五〇·〇〇〇元）植物

中國而言，依照道教規定，人民參與地方政治，採取直接民主政治的形態，就是人民對於縣議會議員和縣長，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於縣立法事項，有創制權和複決權；這是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屬於直接民權，人民參與中央政治，採取間接民主政治的形態，即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某種官吏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於全國立法事項有創制權和複決權，這時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屬於間接民權，同是四種政權，前種場合屬於直接民權，後種場合屬於間接民權，可知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的區別，在於行使的方式，不在於民權的內容。民權的內容，本來隨時而變，因地而異，並不是刻板的東西。某些權力古代屬於政府的，近代則屬人民；某些權力，甲國為政府所有，乙國則由人民行使。或者前時屬於直接民權的，現在演變成為間接民權；甲國屬於直接民權的，乙國則為間接民權。所以我們只能說某地某些權力是政府權，某些權力是人民權，或者某種民權是直接民權，某種民權是間接民權；却不能斷言某地某些權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人民權，某些權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直接民權，某些民權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間接民權，有人看到歐美民主國家的議會享有預算、決算、宣戰、講和幾種權力，遂以為這幾種權力應無時無地而非間接民權，就犯了刻舟救劍的錯誤。實則這幾種權力在那些國家固屬間接民權，但並非任何時期，一切民主國家都非以此為間接民權不可。這是我們應該深切注意的。（元迪）

二、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根本

問題

編者先生：貴刊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貴刊的名字，「新認識」無疑的她在供給我們的各種智識，是用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使我們對各種社會現象與思想有一個新的認識，我是一個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而對黨派有興趣的青年，坊間各種討論黨派的小冊子我都涉獵過，我現在要跟先生討論一個關於共產黨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過去為中國內部之一大勢力，抗戰以還，雖名義上已取消其組織之存在，而實際上並未有多大改變，所以該黨內幕的究竟，仍為國民值得注意的問題。但因爲資料的缺乏，對於該黨所發生的種種疑問，往往無法解決，現在我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想提出來請求指示，即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些基本政策，中共自己是否有最後決定的能力？這個關於一個政黨的根問題，尚祈不吝詳細賜覆。讀者劉立中謹上

立中先生：一個政黨，無論對內對外之一切，多少均有其秘密性，故欲澈底了解一個政黨之究竟，並非易事。關於來信所提及之問題，就我們手頭所有之材料，可作答覆如下：

中國社會中，最大多數是農民，生活最痛苦的也是農民，而土地分配狀況之不合理，又為農民生活困苦之一大原因。故國內政黨，無不注意於土地問題之解決。國民黨的民生

主義中，首提出「平均地權」之主張，而土地革命在中國共產黨亦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他們認為土地革命「乃消滅國內最後封建遺跡的堅決最徹底的方法」。其土地革命之主張，則為「把土地變為社會的共有財產」即實行「土地國有」。「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

即以共產黨最基本的土地政策作為一例，亦可看出中國共產黨之變動性及其與第三國際之關係。中國共產黨很早就主張「積極」而「迅速」的推行土地革命了，故嘗云：「土地國有口號乃不是一個宣傳口號，已是一個實行的口號了」。「應積極作社會主義的宣傳，將民權革命很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同時，各地蘇維埃已禁止土地買賣和租借的所有權，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就是土地國有的實現」。（均見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赤區行委主席團土地問題決議案）但後來，因為第三國際的指示和事實上的難行，竟完全轉變過來，而說「土地國有只是宣傳口號，尚未到實行的階段」——本黨第六次大會及國際最近指示，沒收地主、廟宇、祠堂及大私有者土地，分配無地和地少的農民，土地國有在目前階段只是宣傳口號。這是鐵一般的正確」其雖然轉變的原因，主要的是為了「國際最近指示」，此外，還有一點理由，據他們自己說是在革命過程中，一般農民尚不足與語「土地國有」，因為農民具有「保守和自私的天性」以上括弧內均見中共中央局第九號通告土地問題及反富農策略）姑不問其原由如何，其基本而重要的政策，竟作如此迅速而輕易的轉變，則為事實。轉變以後，因為難以自圓其說

，所以以空洞的「這是鐵一般的正確」一語來掩飾。

到西安事變以後，中共所宣佈之共赴國難宣言，第二項有云，「……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是共黨最重要最基本的政策。但從上面所引三段共黨本身之文獻中，可以看出共黨對於其基本政策，是何何矛盾，變動。全時，亦可以看出其受第三國際之影響為如何？

中國共產黨為第三國際之一部分，其一切重要政策最後決定之權，均操之於第三國際，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一九二三年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即為第三國際之命令。此後，讀中共黨史，均足證明此點之正確。一九二七年共黨革命之失敗，一般共產黨員，認為革命失敗之原因，是由於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的辯白：「……機會主義的來源於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權力」因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多舉，但看陳獨秀這一段話，已可知道，在中國境內，欲求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政黨，其理論完全是外國的東西，其政策之決定，亦基於國際，不顧中國的特殊環境，欲求勉強的推行，真是太危險的事情。一九二三年，蘇聯代表越飛與中山先生聯合宣言之第二點：「孫先生認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越飛亦經同意」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政府實現而奮鬥」這兩項聲明均值得今日中國國民之三思。（施詩）

油類(九八八·〇〇〇元)棉類(五八五·〇〇〇元)等，除草帽類以外，主要物品都是經過上海而輸出的。
在中美的貿易平衡上，仍以美國佔有利地位。如以美元計算，中國一月份自美輸入的物品，計四·七八五·七三

憲政與自治

劉漢興

民主政治的成功，需要每個人民都有自治的經驗，而取得自治經驗唯一可靠的方法，厥為地方自治。因為地方自治問題，是省縣的行政問題，祇有地方自治辦得好，縣政才能走上軌道，縣政辦得好省政才有基礎，省縣行政得到解決，才能够得上實行憲政。我們的敵人明治維新以後，即實行憲政，但因沒有經過地方自治的訓練，所以到現在為止，依舊是軍閥專權，人民不能過問政治。再就歐美來講，法國革命經過了幾度的帝制與共和，鬧了七八十年方才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反之如美國經過幾年的奮鬥，便走上自治的道路，此中的關係，固然很複雜，可是最主要的，是美國革命時，人民已經有了自治的基礎，所以成功自然較法國迅速。至於中國，雖然沒有法國革命前的種種束縛，但也趕不上美國人民的自治基礎，所以想不再蹈日本的覆轍，便當急起直追推行地方自治，為實施憲政的準備。

全民政治是民權主義的核心。而欲使人民能自動的行使選舉、制制、複決及罷免四種政權，也祇能由分縣自治做起

美元，而中國輸美的出口則只有三·一二二·五二八〇元，中國的入超為一·六六三·一八五〇元。(譯自三月二十二號密勒氏評論週報)

。因為地方政治的範圍小，比鄰接壤，家喻戶曉，所以人民容易練習自治的技術，及學習做公民的義務與責任。假如在狹小的保甲鄉鎮尚不能治人或治於人，那麼到了比較廣大的範圍裏，自然不能發生自治的能力。中國自清季以還，雖曾幾度實施憲政；可是皆是由上層的官僚階級所操縱，而非由下層的民衆做起，結果未經訓練的人民，猝然接受了統治全國的政權，感到手足無措，運用失當。而官僚遂得乘機活動，賄賂公行，假自治之名，行獨裁之實，所以直到現在，仍然忘不了袁世凱的竊持國柄及十三年的國是會議，使總理貫徹憲政的初衷，不能實現。

次之：均權制度的好處，是一面能發揮集權作用，一面又能表現分治的精神。尤其在抗戰建國的時候，我們固然要集中權力共同抗日，可是對內又要顧到各地方複雜錯綜的習慣，及乖離矛盾的風俗，同時有各種不同的方言，不同的宗教，假如要實行集權，各地未免又有創足適履的痛苦。更加中國是個禮教立國的國家，宗族的勢力和倫理的觀念，都根

強經，所以各種政治的設施，要不違反中國的國情，祇有推行本三民主義而創造的地方自治制度，才能使中央與地方同時發揮抗戰的力量。

同時，地方自治是建設事業的開始。總理告訴我們：

「我們實行主義，如果不從地方自治着手，則第一社會民衆沒有組織訓練，政治基礎不能確立；第二民衆沒有自治知識能力，一切建設事業不能推動。」——總裁更明切的指示：「建設的方法，就是要從實行地方自治做起。」過去十幾年，因爲一般人沒有認清楚這個基本方案，所以黨治沒有基礎，主義無法實行。例如戶口無確實的調查與統計，所以兵役制度不能順利的推行，徵集的時候，每多冒名頂替，而訓練的時候，又有虛報浮報的事實發生。又如保甲制度，本來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有顯著的成績，不但可加強下級行政機構的基礎，更可作將來自治的準備。可是因爲編組時的敷衍塞責，上下相蒙，戶口不與門牌相符，保甲長不與職位相稱，所以結果不但無補於地方建設，而且保甲長常藉徵兵之名強人售員頂替，或利用公債而乘機榨取，使政府與人民若冤仇，而前方將士卻未沾微利。其他如道路交通公安警衛測量土地，開發礦產，都不能逐步進展，最大的原因，就是地方自治沒有完成。否則舉國同心，上行下效，地方的人力財力物力可以準時集中總動員的計劃，更可早日實現了。

最近關於憲政運動的呼聲，甚囂塵上，可是有的迷信憲政以爲憲法一經頒布，那麼中國便可得救了，有的人也想利用憲政，搶奪權利，假如有這種企圖的人，來實施憲政必無誠意可言，最近 總裁在第五屆參政會休會詞中，曾嚴重

地告誡我們：「認爲制憲一事，是要完全替國家百年利害打算，要借鑑於過去苦痛的教訓和經驗，爲將來施行憲法時，訂定良好基礎。」從這幾句詞當中我們可以推想到所爲過去的經驗，就是自治沒有辦好，而將來的基礎，也建立在發展經濟及推行地方自治上面。

過去自治工作的失敗，理由甚多，也用不着詳加分析，至於今後自治工作的動向，有幾點值得考慮：

第一使人民認識自治的真實意義。過去辦理自治的人，使自治與人民實際生活分離。所以自治僅足以增加人民負擔，於日常生活，無所裨益。自然一般人對自治不感到絲毫興趣。此後應當徵求民意舉辦各種集體生產事業，將其贏利，復平均分配於人民，感到自治是利於自己因而對於政治與憲法逐漸感到興趣。政府在可能範圍內，當扶植各種以縣爲單位的經濟事業，如興殖造林，交通水電等，以謀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打破過去政府與民爭利的不良觀念。必如此，方能使人民認識自治與憲政的真諦。

第二政府當扶導人民自治，總理講過：「古之建國，先朝廷而後百官，人民則更非所計。」因此中國過去的政治系統，大多是頭重腳輕而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是自治這個問題一般人民看來，都不大順眼，而近年來雖然政府大事提倡，可是因爲政府，黨部慣民衆各自孤立，不相統率，有時黨與政府脫節，政府又與民衆脫節，所以三者的力量不能集中，而自治亦不能收取最大的成果。但至最近一縣各級組織綱要一頒布以後，明令縣爲自治單位，鄉鎮同爲縣自治的階層，自上而下，脈絡貫通。同時依照 總裁手定的

黨政關係圖表中，明白規定黨政雙方的任務，在管教養衛共同事業範圍之內，政府負執行之責，黨部負責倡導促進之責，此後有專成，各不相犯，共同扶導人民，勵行自治，且政府如可能範圍內，當選派各種訓練合格的人員，到各地方指導協助，一面可傳達政府的方針，一面又可補地方人才之不足，這樣一舉，自治便可有長足的進展了。

第三努力完成自治：許多人講，農家國家祇能行獨裁政治，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才能實施民主政治。這種講法，固然不是天經地義，也有值得考慮的地方。總之，要努力完成自治，一定要普遍教育及確立經濟基礎。現在中國的文盲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連自治法規都看不懂，更談不到認真

考試訓練與任用

廿八年度高考初試及格人員現正實施訓練，最近中央又有人事行政會議的召集，這是建立人事行政制度與改進國家吏治的大關鍵，我們願就考試訓練與任用三方面加以論列。

選賢與能，為我國政治哲學的精髓；考試選士，為我國固有政制的一大特色。十九世紀英國建立文官制度，便是取法我國。今日美德法諸國都有優良的公務制度，而我國反有禮失求諸野之感。總裁最近發揮政治的道理，便是「為政以人」。人治法治雖似相反而實相成，我們要實現法治，當自樹立人事制度始。

約去執行權利與義務。在經濟方面日奔走於衣食，尚且不暇，進一步再要他拿出足額的經費來襄助自治，真是書生幻想。不過現在政府於教管方面努力推行保中心學校，在經濟方面，總裁在去年五月召開的全國生產會議講詞中曾提出下列幾點：一，集中資本；二，以國防為中心；三，發展固有生產，保持全國生產自給；四，研究科學技術；五，厲行節約；六，勞資合作，同時在組織方面，更有川康建設期成會，西南經濟協會，川康經濟協會等團體。以固定的組織，來完成理想的計畫，使人民實際生活得到保障；那麼自治的基本條件具備，憲政的實施亦可如期完成了。

楊允元

考試既為選拔人才的途徑，則考試的科目和方法，便是人才的權衡尺度，必須有客觀可靠的標準。本屆高考分組，比較歷屆增加，第一屆僅有普通行政、外交官、教育行政、財務行政和警察行政五組。第二屆分七組，這屆計分普通行政、外交官領事官、教育行政、財務行政、會計審計、統計、司法官、經濟行政、土地行政、和合作行政十組，由考試組別的分化演進，也可以看出我國政治專業化的趨向。又考試分場，從前多至三試，這屆變一試，既省時間精力，對於

應試者也有全盤合理的衡量，這都是考試方法改進的地方，不過命題數目除國文一向都是作文一題和公文一題外，各科都是三題，這次都減為二題，由測驗原理，我們知道取樣(Sampling)太少，是可以影響到成績的可靠性的。兩個題目有極大的機會成分，應試者可因一題之失而一科不及格，影響到取錄標準，此中也許不無滄海遺珠之恨罷？其次題目之評義，應當確定，一個題可有多少作答案，應考者可煩染作答，此外命題閱卷，對於複雜問題的推理，主要事實的記憶，和實際問題的判斷，都應當顧到，我們不知道主考者的評閱標準如何，但認為評閱各科——除國文外過於偏重文詞甚至書法，是會失了測驗各科的正確性的，總之，考試制度的建立，有待於考試方法的改良，高考為國家的掄才大典，必須視為重大名器，今後考試方法的厘訂，除各科專家外，應有測驗學者的參加，一切科目試題的數目方式，以至評閱標準，都應力求客觀，完成考試標準化的要件。

二

自本屆起，初試及格人員須經訓練，然後舉行再試，這是考試制的一大革新，也可說是我國吏治前途的一大希望，昔日科舉時代，成進士後可入翰林院講習當時典章文物制度，以為經世致用的準備另外一種入仕的途徑，便是學幕，無論錢穀，刑名，都經過長期嚴格的觀摩和實習，所以常是政治人物的所自出，曾文正於道光卅年應召上疏陳言說：

「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

……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

人才的任用，決不是甄別選拔就算了事，還得加以轉移培養，轉移培養便是訓練，政治基於人才，人才由於學術，是顯明的道理，而今日的專家政治，更是建立於學術基礎之上。

過去考試及格人員，錄取後就分發工作，書生初入仕途，常難適應圓滿，反給專用私人的官僚一大口實，也就是考試錄取人員不能得到合法任用與保障的一大癥結，此次改制，是很能切中時弊的，並且實施訓練的宗旨，在培養「服從黨義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於職務，以負荷革命建國責任之公務員」因此，關於考試後訓練的實施，我們願闡述下列三要義：

第一，培養現代國家的公務員，要建設現代國家，要有現代國家的政府，更要具備現代國家的公務員，一個國家自有其立國的主義和國策，公務員是主義國策的奉行着，必須有共同的目標信念和步驟，具有現代公務員應有的知能，這便是訓練實施的一大要義，

第二，準備公務員行政實務的能力，今日的官場老吏，竟是紹興師爺的別名；而由考試出身的青年，又多偏於書本知識，因此考試錄取後，必須再加訓練，養成行政實務組織活動等能力，而今日講專家政治，必須以分工專精的方法，提高行政效率，今日通病，一般官吏或輾轉遷徙，或兼職遙攝，好像非此不足以表示賢者多勞的樣子，反映到政治上便有「百廢俱興，一事無成」之謂，今後要實現政治專業化的理想，公務員的訓練，除基本精神與一般知能外，必須注重

學有專長，學其所用，然後將來才可以用其所學，發揮服務的**最大效能**。

第三，對於過去教育的補充與改造，恕作者冒昧，要借用再教育(Re-education)一詞，我們不必諱言，考試及格人員過去所受的教育的情形不同，或免不了缺陷，或失之不足，而有改造與補充的必要，尤其是在精神教育方面，要革除**泄沓、頹廢、躁急、自私等不良習氣**，養成優良的公私生活習慣，發揚奉公守法與創造進取的服務精神。

就本屆實際訓練情形說，訓練時間為一年，依所訂公務員訓練大綱，課程的組織，實習的分配，和訓導的實施，都有極精密的規定、無疑的，這是歷來訓練經驗和當局者卓見遠識的結晶，我們殊無贅一辭的餘地。不過也有一二值得考慮的地方：如班級過大，課程都不分組，教學實施有困難，錄取人員學歷不同，服務的時間經驗，也有很大的差異，教學和實習的比例，似有酌分二部加以輕重區別的**必要**。

三

最後說到任用問題。

依公務員任用法，考試及格者必須「儘先任用」，但事實上歷屆錄取人員的數量不大，而任用的情形很難使一般愛護考試制度者滿意。比較歐美文官制度，英國有公務員任用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主持考選，又有財務

部(Treasury Department)負保障任用之責，如公務員資格分等，升降，遷調和俸給等工作，前者有如我之考選委員會，後者有如我之銓敘部，美國中央有銓敘局(Bureau of efficiency)有銓敘「就是「效率」的異名，可見其注重考試的用意，原來歐美考選權，都是隸屬行政部門，而我國考試獨立，是總理的大發明，應更能發揮人事行政的大效用。今後對於考試及格人員，如何依法任用，對於現任公務員，如何甄別，如何實施「任免否認權」(註一)如何履行公務員考績法，這次入事行政會議都有詳盡的提案和討論，想必有具體有效的方法，去求實現。

四

總之，要建立聯繫人治和法治的人事制度，第一、要改善考試方法，為國求才，甯缺毋濫。第二、實施有效訓練，培養健全公務員。第三、依法任用，給予保障，並嚴行考績法，本屆公務員訓練已經開始了，希望今後按期考試，繼續訓練，造成一批有守有毅有能擔當的公務員，在全國七十萬公務員(註二)的陣營中，發生優良的酵素作用，為明日新中國的前導。

註一：見考試院組織法第十五條

註二：見張金鑑：現代吏治制度之剖視，新政治二卷二期

讀者信箱

我們很愉快的接到十幾個讀者給我們來信，有的對我們的刊物表示欽佩，有的對我們的刊物供獻極多可貴的意見，有的向我們提出若干問題，望我們回答。這些使我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慚愧，因為我們的刊物還誕生不久，便能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而我們這些編者，更是才疏學淺缺乏經驗的青年學子，居然荷蒙諸讀者對我們的厚望，我們不知如何努力，方能肩負起這種重任！我們除了向諸位讀者致謝外，並加倍的努力，使這個刊物發揚光大起來。這次我們收到的問題有十五個之多，因限於篇幅，現在只能刊出兩個比較有意義的問題。其餘便用書面解答，直接寄交發問的讀者。此後還希望讀者諸君不斷發問。

編者

一、何謂直接民權？何謂間接民

權？

編輯先生：我是一個讀工程的，但對現代政治思想等問題很有興趣，貴刊每一篇文章我都愛讀，似乎都給我不少的智識，我現在有一個問題，想煩你告訴我，就是何謂直接民權？何謂間接民權？我查了幾本政治學的書籍和辭典，都得不到滿意的解答，因此特地請教先生，希望你對於兩者的區別和內容，加以明確的指示。

(貴刊一讀者)羅之伸謹上勞動節

之伸先生：這個問題看來似很淺近，實際上却是不易解答。我現在對它作如左的說明，未知能否使你滿意：

民主政治有兩種：其由人民親自行使民權的，叫做直接民主政治；其由人民選舉代表，由代表代為行使民權的，叫做間接民主政治。人民在直接民主政治之下所享有的民權，是謂直接民權；在間接民主政治之下所享有的民權，是謂間接民權。例如古代的雅典、現在美國、瑞士的少數地方(美國 New England 州一帶的鎮(Township)、瑞士 Glarus, Upper Unter Walden, Lower Unter Walden, Exterior Appenzell, Interior Appenzell 等縣(Cantons))，其民權由全體公民組織公民大會親自行使。這種政治就是直接民主政治，公民大會所享有的民權，就是直接民權；英、美、法等國的民權，由人民選舉議員，組織議會代為行使，這種政治就是間接民主政治，議會所享有的民權，就是間接民權，再就

中國而言，依照道教規定，人民參與地方政治，採取直接民主政治的形態，就是人民對於縣議會議員和縣長，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於縣立法事項，有創制權和複決權；這是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屬於直接民權，人民參與中央政治，採取間接民主政治的形態，即由人民選舉國民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對於中央某種官吏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於全國立法事項有創制權和複決權，這時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屬於間接民權，同是四種政權，前種場合屬於直接民權，後種場合屬於間接民權，可知直接民權和間接民權的區別，在於行使的方式，不在於民權的內容。民權的內容，本來隨時而變，因地而異，並不是刻板的東西。某些權力古代屬於政府的，近代則屬人民；某些權力，甲國為政府所有，乙國則由人民行使。或者前時屬於直接民權的，現在演變成爲間接民權；甲國屬於直接民權的，乙國則爲間接民權。所以我們只能說某地某些權力是政府權，某些權力是人民權，或者某種民權是直接民權，某種民權是間接民權；却不能斷言某些權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人民權，某些權力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直接民權，某些民權無論在何時何地都是間接民權，有人看到歐美民主國家的議會享有預算、決算、宣戰、講和幾種權力，遂以爲這幾種權力應無時無地而非間接民權，就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實則這幾種權力在那些國家固屬間接民權，但並非任何時期，一切民主國家都非以此爲間接民權不可。這是我們應該深切注意的。（元迪）

二、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根本

問題

讀者先生：貴刊給我的第一個印像是貴刊的名字，「新認識」無疑的她在供給我們的各種智識，是用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使我們對各種社會現象與思想有一個新的認識，我是一個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而對黨派有興趣的青年，坊間各種討論黨派的小冊子我都涉獵過，我現在要跟先生討論一個關於共產黨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過去爲中國內部之一大勢力，抗戰以還，雖名義上已取消其組織之存在，而實際上並未有多大改變，所以該黨內幕的究竟，仍爲國民值得注意的問題。但因爲資料的缺乏，對於該黨所發生的種種疑問，往往無法解決，現在我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想提出來請求指示，即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些基本政策，中共自己是否有最後決定的能力？這個關於一個政黨的根問題，尚祈不吝詳細賜覆。讀者劉立中謹上

立中先生：一個政黨，無論對內對外之一切，多少均有其秘密性，故欲澈底了解一個政黨之究竟，並非易事。關於來信所提及之問題，就我們手頭所有之材料，可作答覆如下：

中國社會中，最大多數是農民，生活最痛苦的也是農民，而土地分配狀況之不合理，又爲農民生活困苦之一大原因。故國內政黨，無不注意於土地問題之解決。國民黨的民生

主義中，首提出「平均地權」之主張，而土地革命在中國共產黨亦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他們認為土地革命「乃消滅國內最後封建遺跡的堅決最徹底的方法」。其土地革命之主張，則為「把土地變為社會的共有財產」即實行「土地國有」。「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

即以共產黨最基本的土地政策作為一例，亦可看出中國共產黨之變動性及其與第三國際之關係。中國共產黨很早就主張「積極」而「迅速」的推行土地革命了，故嘗云：「土地國有口號乃不是一個宣傳口號，已是一個實行的口號了。」「應積極作社會主義的宣傳，將民權革命很迅速的轉變到社會主義前途，同時，各地蘇維埃已禁止土地買賣和租借的所有權，農民只有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屬於蘇維埃，就是土地國有的實現」（均見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赤區行委主席團土地問題決議案）但後來，因為第三國際的指示和事實上的難行，竟完全轉變過來，而說「土地國有只是宣傳口號，尚未到實行的階段」——本黨第六次大會及國際最近指示，沒收地主、廟宇、祠堂及大私有者土地，分配無地和地少的農民，土地國有在目前階段只是宣傳口號。這是鐵一般的正確」其雖然轉變的原因，主要的是為了「國際最近指示」，此外，還有一點理由，據他們自己說是在革命過程中，一般農民尚不足與語「土地國有」，因為農民具有「保守和自私的天性」以上括弧內均見中共中央局第九號通告土地問題及反富農策略）姑不問其原因如何，其基本而重要的政策，竟作如此迅速而輕易的轉變，則為事實。轉變以後，因為難以自圓其說

，所以以空洞的「這是鐵一般的正確」一語來掩飾。

到西安事變以後，中共所宣佈之共赴國難宣言，第二項有云，「……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政策」。

土地革命是共黨最重要最基本的政策。但從上面所引三段共黨本身之文獻中，可以看出共黨對於其基本政策，是何何矛盾，變動。全時，亦可以看出其受第三國際之影響為何何？

中國共產黨為第三國際之一部分，其一切重要政策最後決定之權，均操之第三國際，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一九三三年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即為第三國際之命令。此後，讀中共黨史，均足證明此點之正確。一九二七年共黨革命之失敗，一般共產黨員，認為革命失敗之原因，是由於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錯誤。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的辯白：「……機會主義的來源於國際，國際是應該負責的。幼稚的中國黨還沒有自己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權力」因限於篇幅我們不能多舉，但看陳獨秀這一段話，已可知道，在中國境內，欲求解決中國問題的一個政黨，其理論完全是外國的東西，其政策之決定，亦基於國際，不顧中國的特殊環境，欲求勉強的推行，真是太危險的事情。一九二三年，蘇聯代表越飛與中山先生聯合宣言之第一點：「孫先生認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越飛亦經同意」西安事變以後，共產宣言第一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政府實現而奮鬥」這兩項聲明均值得今日中國國民之三思。（施詩）

編輯後記

陳石孚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教授，國內有數學者。在「論我國社會之構造」一文內，先生以學術的見地，用考證的工夫，說明我國社會是由××××××××××七種分子組合而成。雖然這是史實，究不失為先生的創見。讀過本文，使我們對過去的中國政治文化社會諸種歷史，有更新的認識與了解。

張道行先生為著名之國際政治學者，執教於中政校外交系，並在外交部供職。「對於世界和平之認識」一文，正針對今日動盪不甯之世界局勢而發。先生首先指出過去對於努力和平的不着實際及缺乏瞭解，然後說明致世界於和平的理想途徑。在這烽火彌天舉世惶惶的目前，張先生實給我們極多的指示！

郭博宣先生對於三民主義有精深之研究，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常為一般人所含混。有人曲解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毫無分別，有人又以爲民生主義不及共產主義的徹底。雖然，在過去已有很多人對於這種錯誤加以糾正，不過在郭先生

的文章裏，又有更深邃更精湛的見解。這對三民主義的信仰者，是一個供獻。

這一期在研究主義理論方面，從量來說，很顯明是增加了。就質而言，我們確實是在精益求精。這一期的作者，對讀者諸君諒該都是相當熟悉，他們的文章不時散見於重慶各大雜誌報章。在每一篇文章裏，都藏有若干獨特新穎的見解，站在學術的立場上講，實在是一種值得稱道的事。不過我們很希望能引起討論和切磋，希望國內若干富有研究興趣而尚未成名的作者們，參加我們的討論，這樣我們才可以有進步。

根據事實的需要，我們在這期特闢「讀者信箱」一欄，以解答讀者的疑問。此後尚望讀者源源來信，不僅是提出讀者本身的疑問，就是對於本刊發現有不滿意時，也可提出詢問。倘若對我們有什麼建議與希望，那又感謝不盡了。

(修業)

新認識月刊 一卷三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兼 新認識月刊社
 發行者 重慶南溫泉一百號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投稿簡則

- (一)本刊歡迎下列各種稿件：(1)闡揚三民主義之理論者
- (2)提供各種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方案者(3)國內
 外大事之評述(4)書評傳記與文藝
- (二)來稿以語體文為主請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除特約稿外
 ，每篇請勿超過五千字
- (三)譯文須註明原文之由來
- (四)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須附足郵資，始可退還
- (六)來稿一經確定登載即奉薄酬，一稿二投者恕不致酬
- (七)投稿人須用真實姓名以示負責
- (八)來稿請寄重慶南溫泉一百號本社收，勿寄私人。
- (九)文稿一經登載版權屬于本社

本報查證雜字第一七五六號
 本報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三二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定價表

全年 預定	半年 預定	零售	辦法		訂購 冊數	價目	
			國內	國外		郵費	費
十二元	六元五角	一元三角	三分	四分	一角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三元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本國郵票十足通用惟以一分及五分爲限

廣告價目

等級	特等	上等	普通	附註：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底或彩印價目另議	(二)凡在本雜誌刊登廣告，長期契約最優待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封面及底封面之內面	正文前後	三十元	二十元
位	五十元	四十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全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而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半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面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面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四分之一	三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十元	十元

(三)如蒙各界惠登請直接向本社接洽